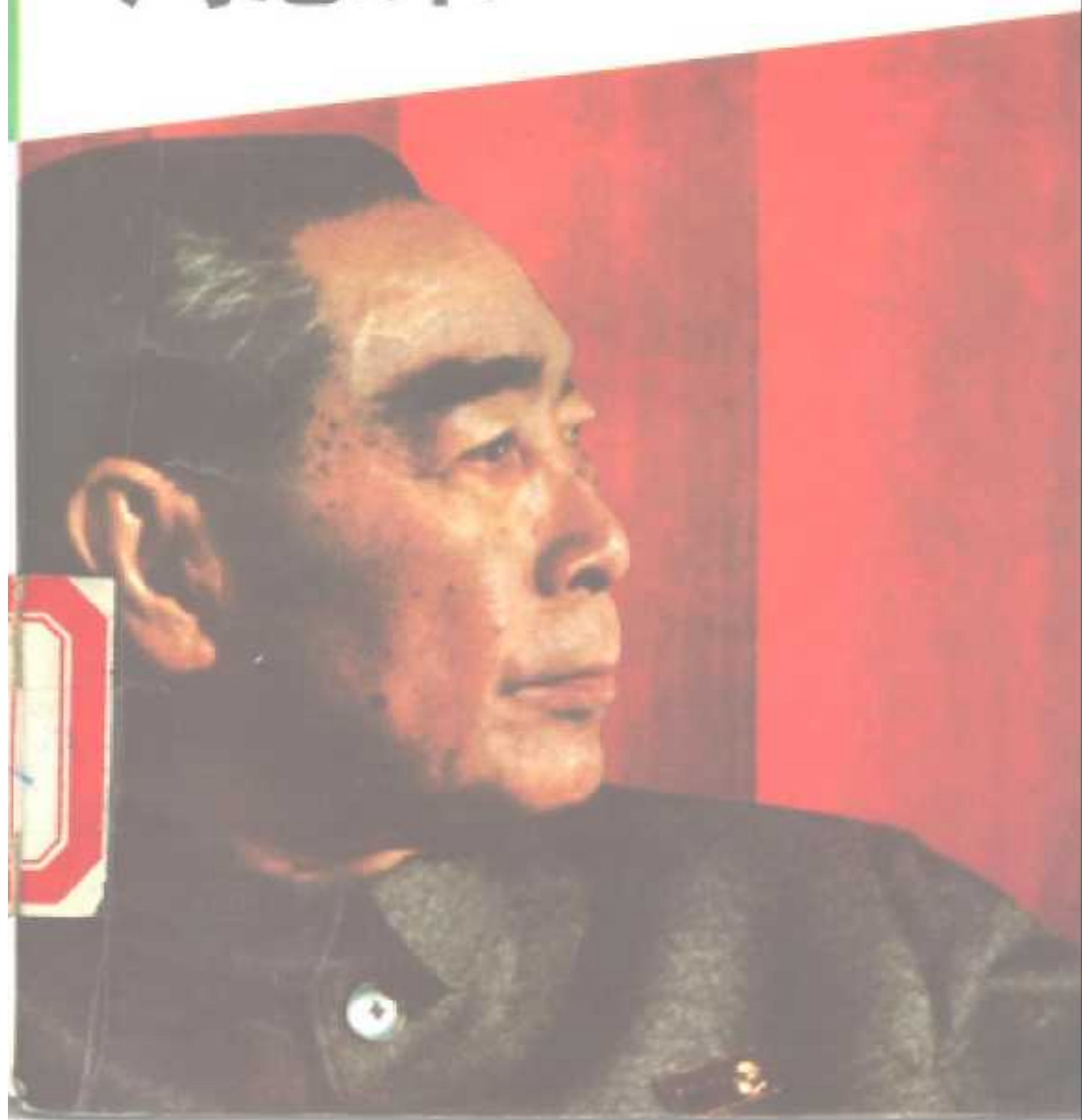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中的 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本社編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05527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1205527



“文化大革命”中的 周恩来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100号

责任编辑 沈丹英
封面设计 张志明
版式设计 冯 力
责任校对 吴白桦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本 社 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北下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5.625印张 120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ISBN 7-5035-0446-3/K·26

定价3.10元



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总理亲临灾区，亲切慰问受灾群众。



1966年10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石油战线先进单位代表时，同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亲切握手。

周恩来一九七〇年八月于庐山会议上，
正值林彪讲话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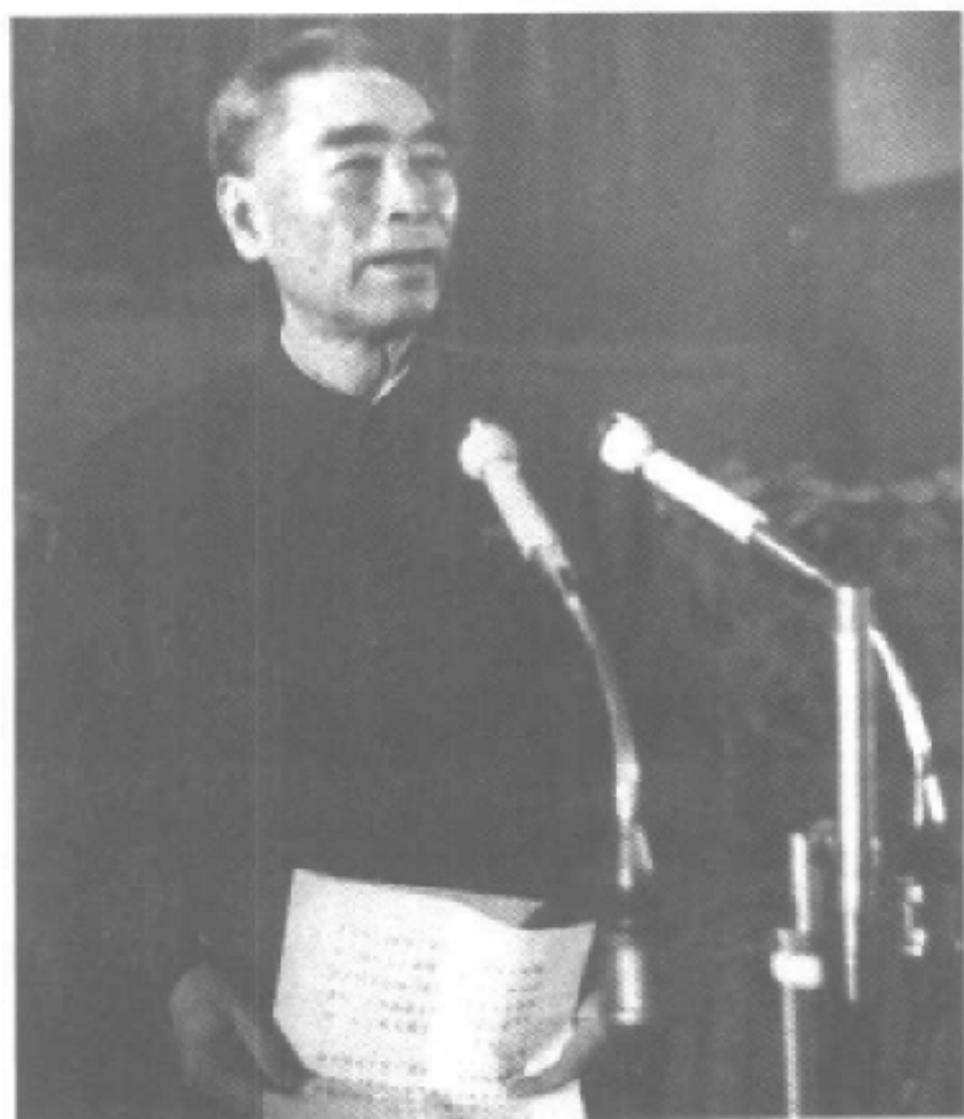
周恩来同叶剑英在一起(1971年7月9日)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来我国访问，周恩来前往机场迎接。



1973年7月17日，周恩来(左一)、周培源(左二)陪同毛泽东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右一)。



1974年9月30日，周恩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国庆招待会上致祝酒词。



1975年4月19日，周恩来同邓小平在医院会见金日成主席。这时，他的病情严重，双脚浮肿，特地做了一双鞋。



1975年6月9日，周恩来不顾重病出席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并致悼词。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目 录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力 平（ 1 ）

把“洪水”纳入河道.....（ 3 ）

殚精竭虑 保护干部.....（ 11 ）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17 ）

批判极左 力挽狂澜.....（ 24 ）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37 ）

周恩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文电述要.....（ 47 ）

一、关心爱护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 49 ）

二、关于经济工作.....（ 59 ）

三、关于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 68 ）

四、推动国际形势向有利于和平、有利于我国

四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79 ）

五、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97 ）

缅怀周恩来总理	(117)
回忆敬爱的周总理 (节选)	谷 牧 (119)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 关怀与保护	谭启龙 (144)
历史的功勋	
——周恩来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进程	
.....	王 立 邱盛云 (154)
周恩来为人民抱病操劳记略.....	戚也竞 力 平 (166)
鞠躬尽瘁 死而未已.....	钱嘉东 (170)
继承遗志 永远向前.....	邓颖超 (174)
 编后记.....	 (178)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力 平

把“洪水”纳入河道

1966年，正当中国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形势要求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了这场狂风暴雨中。

“文革”开始前，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合谋“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张等约定向周恩来封锁消息。文章写出后，江青说：

“不叫周恩来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11月30日《人民日报》才被迫转载。转载时加的编者按，是经过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他在编者按中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按照学术问题，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讨论。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开。在这个会上，攻击了周恩来，说周恩来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给他戴上了很大的“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8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

深入各地推动抗旱。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大地还在颤抖，他就赶到灾区。正当他在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时，突然又发生了五级以上地震，房屋剧烈摇晃，泥土刷刷往下掉。大家急切地说：“总理，离开这里吧！”但是周恩来拒绝了。他在这里工作了四个多小时，第二天又去一个窝棚一个窝棚地慰问受灾群众。从灾区回来后，他又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我国参观访问。5月25日北大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已经是毛泽东批评派工作组的时候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地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这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

1966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

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后唆使学生、红卫兵“造反”、“火烧”、“炮轰”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妄图搞得天下大乱，以便他们乱中夺权。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稳住局面。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极力平稳局势，但是要作到这一点是十分艰难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权由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着，他们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是一场持续而曲折的斗争。

有的外国作家描述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1〕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象洪水猛兽，已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部门，“红卫兵”冲击机关、揪斗干部的事不断发生。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联络什么？他是要把洪水纳入河道中去流。他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在联络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接着，他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从8月下旬到12月中这3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有些会长达四五小时，有些会通宵达旦。他千方百计引导青少年按党的政策办事。周恩来在讲话中，一再指出建国以来的17年中，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大于缺点，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部要一分为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并不等于“黑帮”，也不是不革命，^{〔1〕}更不是反革命^{〔2〕}。他谆谆告诫红卫兵：“不能说全中国的大学、中学所有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机关的领导

都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某些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也不能划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说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3〕}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青年们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连，到处“造反”，社会动荡不安。9月中旬，由周恩来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毛泽东后发出。其中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等。这两个文件发下去后，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它们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文革”初期的破坏性影响。

这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批转总参、总政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建议，报毛泽东同意后发出。同日，又报毛泽东后发出中央指示：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部按上述总参、总政建议办。周恩来还专门加了一句：“已经有红卫兵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内外串连”，要他们自动地取消。

这月底，他在审阅国庆《人民日报》社论稿时，认为“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

并亲自作了修改。10月1日，林彪在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由于毛泽东的坚持，这一提法未作修改，于是，周恩来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江青一伙是感到十分恼火的。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里边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还公然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他主持起草并发出中央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科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上述方法，同样适用于革命学生组织与农村公社、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不应干涉他们本身的革命和生产、业务问题。”〔4〕

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众攻击上海市

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陶铸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但是“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去上海处理这一事件。张春桥和王洪文达成协议，同意他们的要求，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党夺权的帮派势力。

在中央，周恩来继续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外面的人冲进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够实现。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春桥、姚文元急忙赶到上海，接见“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等，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6日，在他们指挥下，以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接着，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夺权之风遍及全国，加剧了混乱。1月28日，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一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稿，规定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周恩来把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发下去，并指出“都适用于地方”，力图扭转混乱局面。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

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周恩来在会上还责问“文革小组”一伙，《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指1966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作者）发表前为什么不送阅？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报毛泽东。从2月25日起到3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这些同志。江青一伙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逆流总后台”。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总理周恩来。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江青曾多次在钓鱼台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诽谤周恩来。周恩来巍然不动。2月18日他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时，继续指出：宣传、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3月21日，他在一个文件上加上：“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党的政策，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给外交路线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有人告知周恩来，周恩来说：“不通。”他在主持中央碰头会时，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

年5月，军队中文艺界的两派都要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演出。周恩来和军委总政治部希望“两派同台演出”，以利于促进团结。但是林彪、叶群支持一派，挑起武斗，造成流血事件。这月，“造反派”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并称“总理是老保”。六七月间，“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多次在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不应是“八一”南昌起义，而应是“九九”秋收起义。也在这期间，江青把解放前国民党在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来立即以事实加以驳斥，说明“纯属敌人伪造”。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企图整垮周恩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王力、关锋、戚本禹加紧组织和操纵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传单，他们要夺“旧国务院的大权”。王力在8月7日讲话，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矛头直指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都表示支持。随即发生了火烧美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林彪在8月9日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混乱达到极点。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指出是大、大、大毒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9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批评红卫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揪军内一小撮”等错误作法。他在会见广州地区各派赴京代表时疾呼

反对武斗，制止武斗。他对财贸口各部“造反派”要夺武器、夺金库表示强硬态度，说“夺就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盗？”“夺金库就开枪”。他在接见前往哈尔滨的调查组人员时，批评了七八月间极左思潮的煽动，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枪，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殚精竭虑 保护干部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切党政机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争焦点。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岗位，他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及保护的同志。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面主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革”之初，周恩来就要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把罗瑞卿“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被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罗被揪走后，周恩来反复做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革”中周恩来对于老师们的保护，更是众所周知的。他很少考虑自

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底的50天中，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造反派”5次，累计20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12月31日，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把几位老师列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周恩来就向他们做工作，说：陈毅、叶剑英两副主席和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副主席，是拥护毛主席的，“以他们做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

“反击二月逆流”后，陈伯达、戚本禹煽动群众攻陈毅，周恩来指示卫戍区布置保护陈毅安全的措施。他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造反派”每次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亲自参加，这是极有力的保护，但又等于是陪斗。对贺龙的保护，周恩来也作了最大的努力。1966年7月，康生诬陷贺龙等在北京“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的材料。12月，周恩来为了贺龙能正常工作和休息，帮他移住国务院新六所。月底，江青煽动群众造贺龙的反。1967年1月9日，林彪亲自攻击贺龙。接着，贺龙家被抄。周恩来让贺龙移住到中南海西花厅。不久，中南海也分成了两个群众组织。周恩来对贺龙说：现在中南海也不安全，我另外给你找个安静地方，休息一下，秋天再接你回来。他安排贺龙移住到西山某处。他不断派人嘱咐国家体委“造反派”：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2月22日，江青要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周恩来严词拒绝。但后来林彪、江青侦知了贺龙藏身之处，把他作了转移，周恩来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林彪死后，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派人专程接回贺龙夫人薛明同她失散5年的孩子们团聚。彭德怀是1966年12月被江青指使“造反派”从成都劫往北京

的。彭德怀所在单位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下达三条指示：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红卫兵把彭德怀劫持到北京火车站后，立即向戚本禹报到。戚本禹眉飞色舞地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通报这个消息，恰好周恩来在场，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随后他就离开会议室，亲自去作安置。彭德怀暂时被“监护”期间，从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对其他老师，周恩来也倍加关注。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他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师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1967年2月上旬，“造反派”在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并通报给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林彪、江青一伙反“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一些群众组织要冲击老师们住地。周恩来专门找卫戍区领导人研究保护措施，要他们把老师们安排在安全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师们受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这年八一建军节，林彪、江青等坚决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招待会，周恩来决定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得到毛泽东同意，他们仍旧出席了招待会。周恩来为了避免意外，还布置了老师从住处到大会堂的行车路线。10月，老师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

前去劝阻、警卫。

1966年12月，当周恩来得知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被揪走后，立即令傅崇碧、周荣鑫把人找回，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并指示要保护好他们。后来卫戍区找回了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批评了抓人的组织。当一些人要揪斗薄一波时，周恩来批示薄“休养六个月”，让他去了广州。12月下旬，国家经委“造反派”赴广州揪薄一波，广东省委报中央办公厅，周恩来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后来，薄一波在被“监护”期间，备受折磨，周恩来指示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当康生煽动一些人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事件”时，周恩来亲自写电报给西北局和吉林省，指出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同时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他们的出狱确为“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地关怀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1日到5日，开5天。到8月4日，决定会期延长，开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始终不发言。9月间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周恩来才继续讲话，说：即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

10月中旬，有的学生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派童小鹏等去布置劝阻。这时，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去听取批判。周恩来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11月中，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从他上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他给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12月，清华的群众组织又提出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动都支持。周恩来知道后嘱咐，如来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王光美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办法。1967年1月，在江青怂恿下，蒯大富企图用谎言把王光美逼出中南海。周恩来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刘少奇家，可惜王光美已受骗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无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清华坐催，终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各门外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5000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周恩来独撑危局，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坚定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

上踏过去。”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他拚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1968年刘少奇病重，医护人员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思潮影响下不愿或不敢去护理，周恩来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护理刘少奇。他在当时环境下作了自己能够作到的一切。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干部的事例，写不胜写。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住进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他劝“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发电报指示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取保护方针。他对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也都想方设法保护。许多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甚至普通党员、一般群众，都深深记得在那个惊涛骇浪中周总理对自己的关怀和保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党内外干部，他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以保证他们的生活。有时候，他根据毛泽东关于保护某人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了一大批；有时候，他采取的保护干部措施事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例如，周恩来要傅崇碧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送到安全住所保护起来，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追问傅崇碧。追得紧了，傅说了句：“上面知道。”周恩来则

坚持不允许批斗。傅崇碧见到毛泽东时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赞同说：“总理做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拍桌子追问，傅崇碧就说：“你们去向主席吧。”江青一伙不敢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毛泽东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尽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到批判所谓“二月逆流”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江青等篡取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这时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化大革命”碰头会还有周恩来参加，他在内部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力能保护的一切，保存党和国家的元气。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起初，“文化大革命”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来既要应付“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明枪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5〕

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

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当时，学生免费乘车“大串连”，周恩来担心铁路停顿和阻塞，整个国民经济瘫痪。林彪、江青等要“天下大乱”，周恩来则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这年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和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稳定。

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领导瘫痪了。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说：“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当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他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谈会，是一次重大的斗争。陈伯达、王力等企图发布他们起草的文件，否定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规定。为了防止把工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他们起草的文件草

案拿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谷牧根据周恩来讲过的精神，写了一个修改稿《十五条》。这是一个防止“文化大革命”把工交生产继续搞乱的文件，明确提出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分期分批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11月22日晚，周恩来、李富春把这个稿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但是，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谷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准备了“汇报提纲”，系统地提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中央文革”一伙人立即围攻批判。6日，林彪对“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说工交座谈会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这次会后，由陈伯达一伙搞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串连等。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达全国。至此，全国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10]

196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是顺利的，仍然保持着60年代前半期调整国民经济的好势头。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逆转。从1967年1月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领导机关陷于瘫痪，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交通运输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

1967年5月周恩来亲自向毛泽东汇报，说明铁路航运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泽东支持这个意见。周恩来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肖华、杨成武、谷牧等讨论，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周恩来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他的良好愿望未能完全实现。

1968年12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是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会议开始后，各地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争吵不休，互不相让。会开到12月27日凌晨，周恩来疲惫已极。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 and 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下达。1969年第一季度将要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1969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到会上作报告，阐述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针对林彪、江青一伙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这期间，他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进行着持续的斗争。1969年7月，二机部汇报说，林彪下令要把在一线的原

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制止了这个毁灭性的破坏。这年4月，他召集李富春、余秋里、粟裕以及国防工办、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冶金部、一机部、三机部、七机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解决飞机生产方面的质量事故问题，批评了取消检验制度。1970年2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3月，他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又说：“不是不要规章制度，合理的不能破。”从1969年起，工农业生产状况有所好转，这是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坚持斗争得来的。但是，由于当时“左”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林彪一伙借口备战，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规模，造成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1970年固定资产投资又过度膨胀。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提交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等的破坏，没有讨论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日益危险的倾向。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6年7月29日在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他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

入苦海谁入苦海”。从这些话可以想见周恩来当时的沉重心情和坚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的干部。他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苦又坚韧的战斗，有时候，甚至不得不说一些不想说不愿说的话，作一些不想作不愿作的事，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7〕周恩来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大局，相当一批干部保存下来了，经济虽然到了崩溃的边缘，但终于没有崩溃。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化大革命’要让我少活10年。”1967年2月3日，他感到异常不舒服，经会诊，发现有了心脏病。他叮嘱秘书保守秘密，这年夏天，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9月21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到1968年9月，总理办公室被迫撤消，只留下了两个秘书，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得由70高龄的周恩来亲自动手。人们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待！”他不能休息。如果他离开岗位，林彪、江青

等正是求之不得。

国外有的作者这样写道：“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一定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8〕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们在结成联盟的同时，彼此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1969年中共九大，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九大后，他们间的矛盾增大，到1970年，林彪一伙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图谋提前“接班”，从而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突然袭击，打乱会议的原定议程，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企图让林彪当上国家元首。周恩来作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协助毛泽东粉碎了这次阴谋。他不顾自己有心脏病，极度操劳，有一回因连续工作36小时而昏厥。会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主持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推动了批陈整风运动逐步展开。1971年3月初，林彪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他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林立果等制订了取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武装政变计划。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5个大军区和10个省市负责人谈话，点名批评林彪及其一伙。林彪策划在途中杀害毛泽东。在北方，林

立果交代必要时“要把周恩来干掉”。由于毛泽东有所察觉，提前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京，林彪他们的谋杀计划没有得逞。9月12日前后，周恩来连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审定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稿。12日晚10时半左右，他得到报告，北戴河林彪住地出现异常情况而且当地有飞机。周恩来下令追查飞机的行动，并令飞机停在那里，任何人不准动。午夜12时半得知林彪强行起飞，周恩来下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13日1时50分，空军调度室报告，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来在荧光屏上消失了。周恩来即乘车到中南海报告毛泽东。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劝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暂住。他指挥了拦截林彪死党周宇驰等劫持的直升飞机的战斗。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保卫北京，保卫中央的工作。后来，得知林彪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周恩来指示我驻蒙古大使带随员亲到现场察看，处理善后。

这次事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指挥调度，防止各种突发事件。他的机智果断的处理，周密的安排，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

批判极左 力挽狂澜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忙于对国内外大事的操劳处理，经常顾不上休息，顾不上吃饭，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有一次，一位烈士子女来探望他，恳求他保重身体。傍

晚在院子里，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位同志，说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他决意面向这场灾难，为党和国家献身的忠诚誓言。这八个字贯串了周恩来的一生。

林彪自我爆炸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1年10月上旬，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消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周恩来等有了一定的条件来设法尽量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给各个领域造成的严重恶果了。他们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平反一些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逐步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并着手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周恩来当时提的是：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在1967年就反对过极左思潮。1968年，他又提过“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年6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9月，他针对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极左偏差，提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因人废文”，指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1971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他针对存在的问题着重讲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批评了“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中，为所欲为”。他说：“自由主义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出现的。”“否定一切，这也是极左

思潮。”这年上半年，他已经在一些会议上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

“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特别是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在实际工作中生效。

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在相继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他强调指出批判极左的重要性，并且针对由于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批评极左思潮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3年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时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8〕}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从1971年底到1973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批判林彪一伙自立政策，自成系统，搞独立王国，破坏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破坏党的经济政策；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在城镇“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起

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济工作十条）。这个文件拿到这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除了“四人帮”把持的上海市外，其余28个省、市、自治区都表示赞成。

当时，周恩来指出，经济工作中存在“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要着重加以解决。1972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工资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是，在1972年，这个问题还没有切实得到解决。这年底，职工人数达到5610万人，工资总数达到340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927亿斤，出现了粮食周转困难的状况。1973年3月，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生气地说：“确实没有‘玉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还说：“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10]他还讲了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批评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等平均主义倾向。

国务院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首先，控制基建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同时压缩基建占用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投资，1973年比上年增加19%。第二，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1972年6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

通知，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和违反国家政策 and 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第三，积极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1972年11月24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写了粮食问题的报告，并转报了商业部的报告，内容是发展粮食生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人数等。中央在12月10日批转了这两个报告，要各地执行。⁽¹¹⁾

经过1972、1973年的努力，“突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反对极左的同时，在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农村政策，重视教育和科研工作，发展对外经济等方面都作了不少工作。1972年2月5日，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这是首次提出整顿的主张。据此，全国计划会议起草了文件，提出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等七项制度，要抓产量、品种、质量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建议由国务院提请中央批转下发。但由于张春桥作梗，没有能发下去。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把工业产品的质量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解决。1971年12月15日他对援外飞机的质量不合格问题作了批示，和叶剑英亲自抓军用飞机质量问题。他指出：质量问题是路线问题。1972年1月，鉴于汽车生产质量下降，他请余秋里抓这个问题。四五月间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的质量问题。这些，推动了许多企业恢复和加强质量管理，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整顿。10至11月间，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财政部、农林部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解决林彪一伙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所造成的经济工作混乱状况，明确提出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

农村方面，也注意纠正一些“左”的政策。197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周恩来还努力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他说：“否定一切，不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12〕}1972年7月1日他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对于杨振宁提出的我国应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建议，表示赞同。不久，他对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说：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钉子就要拔掉。9月，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结合起来，这件事不能再迟了。10月，他针对当时正常升学制度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情况，提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教育提出的富有胆识的主张，是后来恢复我国大学招生制度的先声。他还对恢复出版事业，加强气象工作，重视外语教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等，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新华

社的工作，提议把新华社的原负责人朱穆之从干校调回来，参与领导，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在对外经济方面，周恩来努力为改善和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创造条件。1973年1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等，总额43亿美元（后来实际对外签约成交39亿6000万美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的局面。这些引进项目到1979年底绝大部分建成投产，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这段期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因此，国民经济逐步回升。1973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财政情况也是好的。这是周恩来所作的重要努力的结果。

在外交方面，我国也打开了新的局面。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还用了很大力气为大量的被打击迫害的党内外干部恢复名誉和安排工作。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经周恩来审查同意，发表了《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9月30日前后，周恩来几次约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强调要继续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他建议在毛泽东处召开一次会议谈党的十大的筹备工作问题，并提议朱德、董必武、许世友等参加。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期间，周恩来分别参加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天津、上海、江苏等小组的讨论，在发言中强调要抓好生产，落实干部政策，要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0月，他同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谈了解放干部和安排工作问题，之后中组部提出了一个几百人的名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讨论，解放干部。他去延安参观七大会址时，提出应陈列朱德、董必武、任弼时、陈毅、贺龙的照片；当1972年12月毛泽东问到谭震林的情况后，周恩来立即写信给有关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这几年中，周恩来常常利用各种纪念日举行活动，通过发表参加人员名单的办法，解放了一批又一批干部。或者由他提出名单建议一批同志参加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报请毛泽东批准，使不少同志从而获得解放。一些冤案如贺龙、“杨、余、傅”等相继平反。限于客观情况一时还不可能平反的，在周恩来的推动和后来邓小平等的支持下，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均予释放。

国外有些人是这样评论的：“由于周，林死后的接班真

室才得以暂时填补。长期的接班斗争，在周的谨慎的战略指导下，才避免让‘四人帮’接了班。由于周的经验和在中央的连续领导，那些被侮辱的干部和高级文职人员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中比较容易地恢复工作。”〔13〕

这里着重说一下周恩来关心邓小平的安全和努力使他重新出来工作。1969年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时，周恩来亲自给省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打电话，要当地加以照顾。正如邓小平在那里劳动的工厂负责人罗明所说：“保护邓小平绝对安全的问题，是周恩来指示的，我们要不打折扣地执行总理的指示。”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对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以制造舆论。

这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14日，毛泽东阅后批给周恩来，称“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并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立即一方面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另一方面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这件事。之后，纪、汪根据谈话精神提出了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

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原来甚为健康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紧张、繁忙而急剧衰弱，除得了心脏病而且多次发作外，1972年5月，医护人员发现周恩来小便中红血球增加，并有细胞变异现象。经专家会诊，确定为膀胱癌。11月，医生向叶剑英、李先念等报告，认为周恩来要特别注意休息。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但万机待理，周恩来不可能真正地得到休息。因治疗一再延宕，到1973年1月5日，他大量便血。

3月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说明了便血的情况，向政治局请假两星期，并提议在自己去玉泉山检查身体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还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10日，他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毛泽东批示同意。3月10日到24日，周恩来到玉泉山检查治疗。10日晚，做了第一次手术。4月9日，周恩来专门约邓小平、卓琳谈话。5月20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在讲话中特别表示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说对于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12月1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接着，周恩来忙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部署，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

议的人员。2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作战事项。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毛泽东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已经有了初步的安排。

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使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分恐惧。他们不断地进行阻挠。1972年8月，周恩来针对江青一伙大搞“空头政治”，造成不敢抓业务，不重视业务的严重情况，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这个指示传达后，江青一伙知道了，就追查来源，并阻挠它的贯彻执行。9月底，周恩来约人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的内容，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写进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都被姚文元勾掉。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了一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称这版文章是“毒草”，在上海组织批判。这年秋，在周恩来提议下，召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周培源（实际上是贯彻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讲话）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在当时发表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科技工作和活跃教师的思想。这个会议遭到张春桥等人的反对，说什么“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回潮”。他们声言要追周培源的后台。周恩来同张春桥进行了斗争，坚持在会议纪要中不能把科技战线写成

是“黑线专政”。11月底，周恩来审阅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设想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阅后批“拟同意”，并送毛泽东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阅。张春桥阅后称：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江青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12月17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在谈到批林问题时，毛泽东说：“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样，对极左思潮批不下去了。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的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措施，提到中央后，也因张春桥的阻挠而没有通过。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的经济工作《十条》，由于张春桥的破坏，也不能下达。江青一伙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但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尽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的错误。

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也是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江青、张春桥极力阻挠干部的解放。对此，叶剑英愤慨地写了一首“过桥”诗，说：“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这首诗道出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难。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具体斗争是不断的。如1973年4月周恩来接见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全体成员时，谈到影片《李双双》，当场点名要那个江青安插在国务院文化组的负责人回答，为什么要批判这部影片，并明确指出这部影

片总的倾向是好的。8月6日，江青在政治局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21日，在召集万里等开会时，听说了卫生战线劳动模范时传祥因被江青点名而受到迫害，周恩来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指示叫为时传祥平反。这年秋冬，江青攻击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夺权，说什么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遭到了毛泽东的斥责。

1974年初，周恩来癌症显著发展，病情加重。1月20日后，连续作治疗。24日，江青一伙背着毛泽东召开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5日，又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这两次大会，经过江青一伙策划，迟群、谢静宜等作了煽动性讲话，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毛泽东扣发了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说他们的“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接着，江青又制造了“蜗牛事件”，以美国康宁公司赠送我四机部代表团成员玻璃蜗牛的工艺品为借口，说这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从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周恩来机智地指示外事部门先查清事实真相和该国风俗习惯。结果说明，蜗牛在美国是常作为礼品和陈设的工艺品，象征幸福、吉祥。康宁公司并无恶意。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下发的收回。

江青一伙对于周恩来等前一时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了不断的反扑。他们针对1973年4月国务院批转科教

组的文件强调高校招生要进行文化考查，说这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宣扬“白卷英雄”张铁生。这年底又利用经过编者精心删改的一个小学生的日记摘编，批所谓“师道尊严”，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教育秩序又遭破坏。他们还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追查周恩来看过和肯定的电影《海霞》是谁推荐的，说这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他们指责电影《创业》是“给什么人树碑立传”。毛泽东看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他们才把已经排印好的批判文章撤版。他们组织了一些写作班子写文章，诬蔑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已经成为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邓小平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并去作报告，江青吵着不同意，直到毛泽东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一时期，由于江青一伙的破坏捣乱，已经趋向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严重混乱，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1974年4月底以后，周恩来病情日益增重。6月1日，他作了第一次大手术，此后就住在三〇五医院里了。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他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说“写老的儒有问题，不然只是刘、林”，对“现在的儒应写文章”。不久她在天津又说“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是重点。她甚至给一个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要“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她们极力攻击周恩来等，

妄图为自己组阁创造条件。这年10月14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平。10月17日，江青等在政治局会议上利用“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矛头指向周恩来。所谓“风庆轮”事件是这样的：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业，1964年，周恩来作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泽东同意。1970年，周恩来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满足需要时，适当买一些船，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交通部派了两个干部去任政委、政治干事。“四人帮”的党羽要他们批国务院、交通部在造船问题上的“洋奴哲学”、“崇洋卖国”，被他们拒绝。“四人帮”的亲信就在上海整了诬告材料，江青一伙借此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扬言要揪后台。“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遭到邓小平的批驳。第二天，他们背着周恩来和政治局，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在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听了后批评了王洪文，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周恩来在医院里得知这事后，同纪登奎、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谈话，了解“风庆轮”事件经过。然后他通过接近毛泽东的同志把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明这事情不象江青她们所说的那样，而是她们预先计划好要整邓小平；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毛泽东听后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且赞扬了邓小平，提议他当第一

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1月上旬，周恩来在医院里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

1974年底，周恩来不顾病情的发展，为了主持开好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仍然紧张地工作着。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江青、张春桥等竭力争取要把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委三个部委的领导岗位。周恩来约李先念等交换意见，感到教育部关系重大，确定以周荣鑫掌管为宜。12月23日，周恩来以重病之躯远行千里，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这一次，还同毛泽东单独谈了话，谈到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事情，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在谈话中，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提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补他为中央副主席，还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周恩来回到北京下飞机后，坚持叫秘书搀着到驾驶舱看望机组人员，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这是他最后一次乘坐飞机。这时，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肠部。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文化、教育两部恢复起来，周荣鑫任教育部长，否定了“四人帮”提名的迟群。9日到10日，他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并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

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

13日至18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他是多么希望实现他从青年时代就抱有的愿望，使中华崛起呀！建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迅速向前发展着，但“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四人帮”则利用“文化大革命”，抛出一种又一种谬论来搞乱人们的思想，为夺权制造舆论。周恩来的重申目标，不啻是拨开浓雾见蓝天，使人们认清了方向，坚定了信念。

这次会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1月下旬，周恩来连日在医院里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嘱咐国务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邓小平把分工列出，“他不好讲，由我讲”。2月1日，他主持了由总理、副总理13人出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同日，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说：“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他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副总理的分工情况，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5年4月底，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

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周恩来的上述安排，遭到“四人帮”的恶毒攻击。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提出要以反对经验主义为“纲”，影射攻击周恩来等。同日，姚文元写文章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王洪文分别找政治局成员谈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邓小平当时就表示反对，说：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笔名梁效）的人谈话说：“党的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随后，“四人帮”把持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影射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所谓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反经验主义，要政治局讨论，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后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说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在姚文元送去的一个报告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以及在1973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搞“四人帮”宗派等问题。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这年8月，毛泽东同北京大学一位教师谈对《水浒》的看法，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晁盖盖于一百〇八

人之外”。江青就借此大做文章，召集于公泳、浩亮、刘庆棠开会，说什么“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17日，她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离开主题大讲评《水浒》，说“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要求大会印发她的讲话稿，并在全国放她的录音。毛泽东得知后严厉地批评她“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制止了江青的无理取闹。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劝阻，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会谈中，他坦然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他说：“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并向外宾介绍了邓小平。10月以后，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卧床不起。24日，再次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在手推车上，向周围的政治局委员们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并握住走上前来的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支持。

周恩来1972年得了癌症，作为病人他应该休息治疗；作为一个对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74岁老人，更应该得到休息和疗养。一向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周恩来，也向他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自己感到疲乏。他何尝不想休息。但是，当时党和国家的现实，“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图谋，他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使他不能考虑休息疗养。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担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正是为此，他患了绝症，却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把生命倾注在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

上，不顾病情的恶化，不顾“四人帮”的攻击叫嚣，全部心力完全彻底地贡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势更重了。但是从这年1月1日到6月1日住进医院之前，他在多数日子里都工作12小时以上，很多日子工作18小时以上，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30个小时。6月1日他带着一大堆文件，告别他的办公室，住进医院。事实上，他只不过是把办公室从西花厅搬到医院罢了。住院期间，他动过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左右动手术一次。但只要身体还能够支持，他仍坚持工作。他同中央的一些老领导同志会面，谈话。例如，他同叶剑英谈话作最后的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召开会议。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他挣扎着去参加了；李富春的追悼会，他也去参加了。董必武去世，周恩来因病重不能参加追悼会，但仍亲自看了悼词……

周恩来晚年，胸前始终挂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是用意深刻的表明心境的证章。他公而无私，全心全意，决心把有限的生命完完全全地贡献给“为人民服务”的事业。邓颖超说过：“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这是十分真实而恰当的写照^[14]。

周恩来在病床上，仍关心着解放干部。他同纪登奎、吴德等谈这个问题，并责成把宋任穷等9人的案件赶快了结。他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指示尽快结束专案审查。1975年参加五一劳动节的人名单是张春桥拟定的，周恩

来很不放心。他发现很多人不在名单中，赶紧找杨德中等去商谈，集中三四十辆小卧车，派人拿着请帖到这些人家中请，来不及参加白天的游园会就参加焰火晚会，第二天名字见报，实际上又解放了一批人。他要公安部开列全部未赦战犯名单，以便特赦。不久，他在医院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问题，后来四届人大常委二次会议作出了特赦的决定。他还谈到一些人的名字，指出应予释放。

周恩来十分关心同“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攻击他，他要秘书找出提反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刊送阅；“四人帮”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他嘱医务人员把《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这一篇和各种版本的《水浒》找来送阅。他还要秘书把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来……

周恩来关心祖国的统一。1975年12月20日，他在病床上约罗青部长谈对台工作问题，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找部门领导人谈话。

周恩来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病中，他对关心他的亲属讲：“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他在病痛的折磨之中，同邓颖超同声合唱国际歌。

1月7日晚，周恩来微睁双眼，对病床前的医生吴阶平等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别

人。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溘然长逝，终年78岁。“巨星殒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15]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沉痛悼念周恩来。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目标。

周恩来永垂不朽，他在亿兆人民心中永在。

1976.1.21

注 释

- 〔1〕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250页，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2〕1966年9月13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全体大会上的讲话。
- 〔3〕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北京市中等学校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
- 〔4〕1966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规定》。
- 〔5〕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的周总理》第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 〔6〕参见余秋里：《中流砥柱 力挽狂澜》，《人民日报》1990年1月11日。
- 〔7〕《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07页。
- 〔8〕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第192页，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63—464页。
- 〔1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64—465页。
- 〔11〕参看陈雪薇：《经济建设的停滞、倒退及其历史教训》。
- 〔1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0、471页。
- 〔13〕德比·戴维森、马克·赛尔登：《周恩来和中国革命》。
- 〔14〕邓颖超：《继承遗志 永远向前》，《不尽的思念》第6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 〔15〕宋任穷：《春蚕到死丝方尽》，《我们的周总理》第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文化大革命”期间
文电述要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多方面进行斗争，以捍卫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关心爱护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周恩来的这些活动，从下边一些文电中，可见一斑。

一、关心爱护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残酷迫害党内外干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挑动群众斗群众。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关心爱护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作了极大的努力。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历史上少见的大地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严重。九日，周恩来立即致信中共中央、毛泽东，对震后工作作了紧急部署。在余震未息的情况下，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亲临震中灾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他在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信中说：

三月八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历史上少见的大地震。这次地震波及邯郸、石家庄、衡水地区。邢台地区损失最重的是隆尧、宁晋、巨鹿三县的三十多个公社，三十二万人的地区，初步统计，死亡七千人以上，重伤两万人以上，房屋倒塌百分之八十左右。牲畜损失情况，估计也很严重。

为了迅速抢救伤员、安定群众情绪、安排好生活，尽快恢复生产，在接到河北省报告后，立即召集国务院有关各办、各部和总参，作了紧急部署：

一、组织以普山⁽¹⁾同志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团员由国务院各办各部参加，共十一人。慰问团的任务是代表中央、国务院进行慰问，帮助各级领导进行抢救、救灾工作，解决需要中央解决的问题。

二、指定总参谋部通知北京军区和当地驻军参加紧急抢救工作。六十三军由军政治委员和副军长组织了前线指挥部，组织了二千以上的医疗队，分别到隆尧、巨鹿、宁晋进行抢救，并在邯郸、正定、石家庄三个医院及和平医院布置抢救和接收工作。六十六军、六十九军和河北军区已组织医疗队待命出发。

三、卫生部已组织北京各方面医务人员五百人以上，携带药品器械从八日开始陆续出发，预计今明两天，全部到达灾区。

四、农业部已派出兽医五十四人，于今天上午出发。

五、财贸办公室已通知商业部、粮食部、财政部和供销总社派员随中央慰问团出发，解决支援救灾的物资和粮款。

六、科学院由地球物理研究所顾功叙(副所长)等二十一人组成考察队，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组成十一人考察队，已于八日晚出发到地震区进行考

察、物测，研究抗震措施。

为了做好抗灾工作，已要求中央慰问团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协同各级领导，突出政治，加强领导，深入现场，做好抗灾的宣传教育工作，切实解决群众的急迫问题，坚定这一地区干部群众依靠党的领导、依靠集体力量克服灾害的信心。对于是否续有地震问题，要提高警惕，组织民兵值班放哨，既要防止再次发生地震而受损失，也要防止地富反坏趁机进行破坏活动，尽快安排好群众生活和恢复生产。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夜，某学校的红卫兵抄查了章士钊的住宅。三十日晨，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八月三十日，周恩来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士钊 程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鼐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2]

(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2) 部长、副部长

(3) 政副

(4) 国副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 两高^[3]

（李宗仁）〔4〕

九月一日，周恩来又命三〇一医院准备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讲话时指出，应当尊重宋庆龄。他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5〕就出了他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中共吉林省委致电中共中央请示问题。十八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共吉林省委并告各中央局的电报，指出不应改变被批斗干部的工资。周恩来写道：

对被批判斗争对象的工资处理意见：即使已定性的，也暂不改变；如本人少领工资，或捐献一部分工资作党费，听其自愿，但不强求，也不许其由减少用费而致病。凡未定性的，工资仍照旧。

当看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中共安徽省委两位书记被连续批斗的情况反映后，周恩来当即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在“情况反映”上批示一定要放出李葆华、李任之。批示说：

请陶铸^{〔6〕}同志以电话找安徽省委一谈。如情况属实，请找八·二七造反团负责人以电话交涉，无论如何要放出李葆华、李任之^{〔7〕}两同志，让他们回家休息。

“文革”初期，康生等人制造了“六十一人案件”，诬陷一大批老干部。为保护这批干部，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刘澜涛等出狱“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北

局的电报，谈到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

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8〕}，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电报，指出九大代表应包括王恩茂。周恩来在电报中写道：

新疆自治区出席九大^{〔9〕}的代表应包括王恩茂^{〔10〕}同志在内。你们已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并为他留出名额。现在你们正面临新的困难。如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需要时间才能选出，可先将王恩茂同志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

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周恩来致毛泽东信，建议徐海东参加九大主席团。内称：

今晚与主席团预选成员和军队主要负责同志协商徐海东^{〔11〕}同志为九大代表。如取得大家同意，拟同时提议徐也参加主席团，然后由各组召集人回到各组征求全体代表同意。徐海东同志既已当代表，就以参加主席团为好，我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

商量都同意。请示主席批准。

当看到《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以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

拟同意送入三〇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四月三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情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周恩来的这一批示，经毛泽东圈阅。

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周恩来给国务院直属口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转人大、政协军代表信，提出不要斗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内称：

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不知已否派去？如已派去，可与他们谈谈政策。

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

机关干部也要在清理队伍时，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

附上邓初民⁽¹²⁾先生一信，请加注意。

当看到华罗庚要求追查被盗手稿的来信后，一九七〇年三月四日，周恩来给国务院直属口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和周恩来派到科学院的联络员批示：

首先，应给华罗庚^{〔13〕}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

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

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西尧^{〔14〕}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

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15〕}，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此事请你们三位办好后告我。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为国务院起草给煤炭工业部的通知。关于张霖之死亡问题，周恩来说：

国务院业务组于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会议，审查了煤炭部军代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和七月三十一日两次报告，以及首都驻北京矿业学院工、军宣队^{〔16〕}专案组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的报告，同时，并阅看了反革命分子戚本禹^{〔17〕}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矿院的公开演说。大家一致认为：张霖之^{〔18〕}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张霖之同志在矿院全校广播中听到戚本禹反革命分子这种威胁

和煽动的语言，而身体已受到重伤，自不能不陷入极度紧张状态，因此，致张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

根据当时情况，矿院专案组的报告只涉及各项经过的表面现象，还需要依照煤炭工业部所掌握的全面材料，认真地予以澄清。

兹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一九七二年，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害。毛泽东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恩来立即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写信，指示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信中说：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将刘建章^[19]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20]、登奎^[21]同志批。

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

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附去主席批示件，请随第三事办好退回。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给王洪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信，这时，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周恩来在信中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提出意见。他说：

昨晚你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萧华^[22]、李力群^[23]、侯宝林^[24]三人，又问及商震^[25]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26]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27]。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28]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29]（张学良^[30]之弟、张学思^[31]之兄，因吕案解案^[32]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

出席有此必要。

二、关于经济工作

“文革”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各地煽动派性，挑动武斗，破坏生产，中断交通，使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周恩来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尽力促进职工队伍的团结，稳定局面，维持生产，减少损失。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修改和审定以国务院名义发给成都拟来北京请愿工人的电报，强调工人请愿不要妨碍生产。他说：

欢迎你们派代表（小厂一人，大厂二至三人，总数请不要超过三百人）来北京商谈。

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

我们希望：在省、市委和厂矿企业的领导方面，要保证不得解雇工人，不得扣工资，不得打击报复，不得用党籍、团籍来威胁工人；在工人同志方面，要保证安排好生产，不要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

你们来京人数确定后望告，以便通知铁道部配车，车费由所属厂矿解决。廖志高^[35]同志也同你们的代表一道来京。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周恩来接见十四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时的谈话指出，要藏富于民。他说：

毛主席说过，农民以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是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你们不要产生错觉，这不是提倡不老实，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整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者不下去，不调查，一九六一年以前实行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城市也是这样，多报人口，口粮就多算了。

土地以多报少，粮食以多报少，人口以少报多，灾情以少报多。两个以多报少，两个以少报多，这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如果我们实事求是，依靠贫下中农，他们就会说真话。

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过去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对产棉花地区要给些化肥和粮食，使他们的生产恢复得快些。我们出口一吨大米可以换回一点七吨小麦或两吨玉米，换回来外汇，很有利嘛！

粮食工作也有错误。以前有过大进大出。征购多了，必然返销，造成假象，徒劳往返。毛主席主张能少购就少购一点，藏富于民是好事。战争打起来还是藏富于民好，特别是要消灭敌人在国境内，这就更有必要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为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事，致函中央文革小组。内称：

送上铁路中断情况电讯八份，请阅。今午在主席处，已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下午曾约集富春^[34]、先念^[35]、剑英^[36]、萧华^[37]、成武^[38]、谷牧^[39]、秋里^[40]各同志会商此事，除已报请批发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命令外，并拟将全国十八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运交海军军管包干，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41]工作，以便统一全国铁路轮船运输，免受干扰。这一计划正由总参草拟，明日当可订出送审。

此外，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周恩来打电话给厦门军管会，要求联合起来保护海港运输。电话指出：

据说，由于厦门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致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三病号，吃喝均成问题。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信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望厦门军管会、调查组接此电话后立即向两派组织号召：对外、对业务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如果哪一派响应

中央、主席号召并见于行动，中央将通报表扬，如拒不执行，中央定于揭露，并命令军管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检查、靠岸装卸。哪一派破坏这一行动，军管会应按《六六通令》〔42〕惩处该派的主使人和肇事头头。

一九六八年，为保护群众，稳定生产，制止武斗，周恩来考虑了一些措施。他在手稿中写道：

取消武斗专业队。

按系统归口接受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不许重拉队伍另立山头，革委会、军管代表要保证任何工人职员不得被赶离本生产工作岗位。凡自动脱离不回厂者要限期回厂，逾期不归的扣发工资，半年不回的开除。

凡回厂者要由革委会、军管代表保护，被打的，要追查凶手，送院治疗，按期送工资。

停止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的自由串连。

不容再运再抢武器弹药。

不许攻夺建筑物，建立据点。

不许抢夺任何公家仓库商品物资。

更不许杀人放火。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解决飞机生产质量事故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应该保留。他说：

飞机因质量事故影响到战备和援外，影响到安全。你们都是空军来的，怎么能对同志的性命这样不负责呢？一个军事工厂搞得这样怎么行？四一〇厂取消了检验制度你们是不是知道？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为什么不下命令恢复？你们就是怕事，怕群众。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军事工厂哪能搞成这样！你们现在还说检验制度正在逐步恢复。什么逐步恢复？你们怎么能这样说话，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句？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当马上恢复！对的、合理的要马上恢复，不对的不恢复。检验是不能放松的。你们应当下命令嘛！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不能违背科学。应该相信工人阶级，只要把道理给他们讲清，他们是不会同意取消这些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对西北、西南、东北都要派人去检查。二十年来，毛主席的红线还是主要的，不能否定一切，要一分为二，不然二十年的工业生产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项目，周恩来给毛泽东、林彪^[43]写信。内称：

去年十月，主席在武汉曾在曾思玉^[44]、刘丰^[45]两同志提议修三峡大坝时说到在目前备战时

期不宜作此想。后来，他们就同水电部、长办^[48]转而设想改修三峡下游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低坝，采用径流发电，既可避免战时轰炸影响下游淹没的危险（低坝垮了只多三亿到八亿五立方米水量的下泄，宜昌到沙市河槽内可以容积），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航运单向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左右，发电装机可达到二百零四万千瓦，保证出电八十万千瓦，时间五年可成）。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本年十月就提出报告请中央列入“四五”计划。中央政治局十一月会议讨论，原则批准，要他们多做水工试验和研究，并写一可靠的水坝工程资料。我和国务院业务组（先念^[47]、登奎^[49]、德生^[50]三同志均参加），与曾思玉、张体学^[50]、林一山^[51]等同志和水电部负责人经多次研究和讨论，认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他们所提出的资料和数据，也是经过十来年的现场地质勘察、水工试验和历史水文记录的积累和分析得来，基本可靠。而在施工过程中，还可精心校正，精心设计，力求避免二十年修水坝的许多错误。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现将中央批复送审稿及报告和附件、附图（二张）呈上，请审阅，并请主席批示^[52]。林一山意见书一并送上，供参阅。

关于要把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周恩来多次作

出指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关于飞机生产质量问题的批示中说：

“歼六”四十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七架不能交付，占全数百分之十七点五。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么！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又在致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余秋里信中再次强调要把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他说：

诸秋里⁽⁵³⁾象剑英⁽⁵⁴⁾同志一样，把长汽、二汽、重汽、南汽⁽⁵⁵⁾抓一抓。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一个月内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周恩来在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报一九七三年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的草稿时，多次插话，要求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他说：

一九六九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场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⁵⁶⁾，影响到一九七三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

大^[57]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

工业生产指标，煤增长最少，电也少啊！这样，生产怎么能上去。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

经济协作区问题怎么提法？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

基本建设战线为什么长？一是中央各部的项目多了，一是地方项目也多了，原因就在这里。中央和地方，首先中央收缩一下。中央、地方都不许扩大建设规模，中央先下一些，给地方留点余地。

基本建设要经常检查，全年抓。一九七〇年基本建设大膨胀，一九七二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

基本建设中的问题，还要说一条，有人在基建中顺手牵羊，搞非生产性建设。当然必要的可以建，如宿舍、商店、学校要建。但是有很多建筑不是这方面的，要指出来。

地方五小工业^[58]要整顿的问题说得不够。搞五小工业也要有原料、材料和设备的保证。没有原料也搞，同大厂争原料，变成自由发展了。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发展五小工业要有个范围，要对农业有利，破坏计划的无论如何不能发展。

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

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

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这不是那么舒服的。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但也不那么舒服。商品有差额，货币回笼不了。职工人数多了，工资多了，货币流通量也一定多了。多是一定要多的，但现在超过了实际需要，要研究这个问题。今年市场平衡有三十亿元的商品差额，票子发多了。

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湖北货币大投放，去年第四季度预支今年的，安徽、江苏也投放。这样大胆地开支，过去是少有的哩！

全国职工总数突破五千万人，一下子达到五千六百多万人。你们要抓一下。民工好减，五小工业工人、临时工要动员回去，现在就要进行工作。

钢那么多，钢材怎么样？前后左右不衔接，出了钢不能轧材，白白消耗了热能。还是十年前存在的问题，一前一后，前后左右总是个大问题。运输能力也不行，进出口拥挤不堪。这些不建设，光搞大品种不行。

按劳分配的问题，现在是四个一样⁽⁵⁹⁾嘛！还

有于难干易一个样。“不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也不利于控制职工人数的增加”，这句话说得对！

必要的奖励制度是可以的。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四日，周恩来给李先念等的信中指出农业生产要注意防涝抗旱。他说：

请你们好好读一下五月十四日的《参考消息》（五二五一期）四版下栏关于世界气象变化的两篇报道，并要气象局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今年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南涝北旱的局面，请告农林部多多提醒各地坚持实行防涝抗旱的措施，不要丝毫松懈。

三、关于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

“文革”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极左思潮，使文教、科技、出版等方面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周恩来为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同他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七日，周恩来同文化教育部门一些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不要因人废文。他说：

王云五^{〔66〕}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的

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来源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吗？可是它们都含有合理的因素。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剥削阶级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却是可以改造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为群众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他们没有好书看，就看坏书。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要学哲学，要反对唯心主义。同志们要好好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

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有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出不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芭蕾舞是洋的，能说是我们创造的吗？我们编的芭蕾舞剧，基础是原来的，内容却是新的，形式又有了改造，这就叫做洋为中用。芭蕾舞还要发展。你们文化部门的同志要好好读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知道一点根嘛！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可以先学《实践论》，要通过实践来提高我们的认识。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等校师生代表时，发表了关于外语教学的谈话。他说：

你们要研究一下，外语师资短训班的效果到底如何？学的能巩固吗？落实的有多少？也许个别人学得快，多数人是平平或较差，个别人不行。如果五十天效果很差，可以向主管部门提出建议，延长一些时间。要抱着对学员负责的态度，否则误人子弟。师资培训不好，将来学生也教不好。短训班质量不行，人家会骂你草草了事。

学外语要天天练。天天练的时间不要仅限于一个小时。如果硬性规定一小时，其他时间就不许练，这种办法一定要脱离群众的。他们是学外语的，将来要做外语工作。外语教师也好，外事工作人员也好，总是要练，要允许人家抽空练。人家自己挤点时间练，不要去干涉！所以天天练不要限于一小时。别的活动多的时候也不要取消练外语。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增到两三个小时。

苦练，应当成为原则。毛主席就强调这一点。写字也要苦练才能写得好。要把语言这个工具用得纯熟，还是要苦练。要看一些新的资料，光看课本不够。

翻译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不仅要有现场经验，还要掌握材料，了解背景，真正翻译得恰当是

不容易的。

现在有的中学英语课本，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实在不适用，应当修改。政治语言和生活语言可以一并学，实际上也不能分。北大英语教材有一个问句：“你出身工人阶级家庭吗？”这个问题局限性太大，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出身？

外语教学有个基本功问题。比如京戏有基本功，唱腔、道白、武打等，这都是京戏艺术的基本功。而且，京戏的基本功不限于京戏艺术本身，还有政治、历史、地理等知识。学外语也是如此，不光是要掌握外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做好听、说、读、写、译五个字，还要懂得历史、地理。不仅要读中国地理、历史，还要读世界地理、历史。自然科学也要懂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懂得很多自然科学知识。毛主席也知道得很多。你不懂这些知识，做翻译时就译不出来。搞翻译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懂几句外国话就行的。不但要有政治水平，同时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没有基本功和丰富的知识不行。基本功包括三个方面：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

外语教学要造就什么人材？第一是师资，有了好的师资，中学生把外语学好了，进大学或以后自学就有了基础。第二是培养懂外语的干部、技术人员，要使他们能够读外文资料。第三是外事工作人员。这三方面的需要都很急迫，需要量最大的是师资，最急需的是外事人员。因此，要认真搞好外语

教学。俄文为什么丢掉呢？一旦需要，量是很大的。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谈话时，指出要讲历史，多出书。他说：

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你们的出版计划中有没有历史书籍？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从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发展来的。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毛主席的著作还有不少篇幅是讲历史的嘛！读毛主席的著作也得懂历史。

同志们说，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地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都读新的，哪有那么多？要有组织地给他们读一点书，总不能把历史割断吧！否定一切，不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分为二，就是极左思潮。

《鲁迅全集》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普列汉诺夫^{〔61〕}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好的著作。把有点问题的书都封起来，只有少数人能看，

只相信自己不会受影响，其他人就都会受影响？群众总是比我们个人知道得多，他们是能够作出判断的。一面说青年没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我看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读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狭窄，这不行，这样是不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毛泽东思想不是孤立产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伟大的实践产生的伟大的知识。

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发表谈话，指出极左思潮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他说：

你们报幕的同志，为什么不报独唱、伴奏人员的名字？看来你们的极左思潮还没有肃清。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

你们的歌越唱越快，越唱越尖，越唱越高。

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结合，要有点地方的色彩。

二十四史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献，对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周恩来非常重视。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他对继续组织

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批示说：

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63〕}先生总其成。究如何为好。请吴庆彤^{〔63〕}提出版会议一议。

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日，周恩来针对“文革”中各单位业务工作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在中央气象局《关于今年第三号台风预报的初步检查报告》上写给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批语中指出，应加强气象工作。他说：

请你们乘此由国务院业务组将气象局业务抓起来，体制暂时不管。

总参、海军、空军哪一位管气象？请剑、春、德^{〔64〕}三位指定专人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会议，整顿气象局全国布局。收听国际气象预报和预测，不知地面卫星站能否通过空中卫星收听更多情报，请打听一下，如行，立即办。凡属空白地区、海岸都要分类补上，对北线西线寒流、东线南线暖流也要管。人不够，要从“五七”干校^{〔65〕}调回，或者将转业或遣散走的调回。要打破军民界限，共同协力，军民两用。预防各种气象变化，特别要防气流、大风突变转向。总结经验，并且要考虑到空气中有无新的因素、元素增变。

妥否，请酌。

周恩来很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一九七二年七月，他指出，“要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并强调有什么障碍就要拔除。二十三日，他写给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的批语说：

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周恩来给张文裕、朱光亚写信，强调要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他说：

文裕^[68]同志交来二机部四〇一所一部十八位同志一信^[67]，已由郭老^[66]、西尧^[69]同志处转到。看了很高兴，正是月初我们同见巴基斯坦那位科学家^[70]时所说的话。

现在请文裕同志将你们今年四月送给二机部和科学院那份报告^[71]转给我一看。西尧同志请朱光亚^[72]同志召集有关方面一议事，请不要等我批，先议出办法，供大家讨论采用。

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将理论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所见可

能有错，请你们研告。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周恩来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博士谈话时指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他说：

我们小学和中学的学制究竟是十年还是十二年，还没有确定。过去是十二年，是不是要这么长，现在还在研究。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当然这总是少数，大多数人要参加劳动，不一定升学。至少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进大学，国家没有这个力量。中学毕业后马上进大学的总是少数，大量的要在生产实践中提高。劳动几年后，有升学机会的当然还可以深造。

一九七二年，湖南医学院要求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尸体进行解剖，以便写出关于尸体医学研究的全面科学报告；同时要求有关单位在对尸体内脏组织进行病理鉴定、审查等方面给予协助。（后来，通过这次解剖获得了珍贵的科学资料。）为这个问题，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洽秋写了关于拟对长沙汉墓尸体进行解剖的请示报告。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对这个报告批示：

王洽秋^{〔19〕}同志：

请约有关同志和专家再议一次。如同意，即请提出一个工作小组名单，协助湖南医学院进行报告⁽⁷⁴⁾中所提的或追加的各项安排和调度。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报一九七三年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草稿时，在谈话中，提出要学习外国的长处。他说：

最近我们出去了两个代表团。一个医学代表团在国外看了回来，不敢做报告。他们要做报告，有一个军代表说，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这么老大，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出去花了不少钱，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科学家代表团出国回来后，连一个报告都没有写出来，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

一九七三年七月六日，廖静文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恢复徐悲鸿纪念馆。七月十五日，毛泽东把廖静文的信批交给周恩来。七月十六日，周恩来写信给廖静文，内称：

廖静文⁽⁷⁵⁾同志：

你给毛主席的信⁽⁷⁶⁾，主席于七月十五日已批交我，要我派人查明恢复。先此奉告，并烦国务院

办公室吴庆彤^[77]同志与你洽商。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六日，周恩来致吴庆彤并转吴德信，请他们议定徐悲鸿纪念馆恢复方案。信称：

庆彤同志阅转吴德^[78]同志：

现将廖静文^[79]同志来信和主席批示送请阅办。

廖所提的不是悲鸿^[80]故居，而是徐悲鸿纪念馆。在一九六五年夏，因修地下铁道就将纪念馆拆除。它所收藏的悲鸿作品、美术文献和一万多件美术图片多分散各处，而悲鸿墓碑也被坏人捣毁。请你们分别查清，并与王冶秋^[81]同志或文化组议定恢复方案，进行筹办。

所查情况，望告。

另附复廖一信，请吴庆彤同志持往洽商（地点在来信封面上）。又及。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周恩来致余湛、王冶秋信，提出出国文物展览可设想两个方案。信称：

余湛^[82]、王冶秋两同志：

可设想两个方案：一个是拿这两个方案的两套展品图录给美国联络处看看，要他们选择，看哪一套展品和时间对他们合适，也可让他们电商国内，或派人到日本、法国亲去参观，进行比较，我还可告以在日展品，将作部分调整，另一个是另搞一套

展品，专为去美洲的，次序是加、美、墨、南美友好国家，而以在日展品，除去罗外，专作在亚、澳展出，如顺序则为伊朗、叙利亚、巴基斯坦等等，以在法展品，专在欧、非展览。可否，请酌！

四、推动国际形势向有利于和平、有利于我国四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极力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反对他们在外交事务中的破坏活动，努力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推动着国际形势向有利于和平、有利于我国四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会谈时指出民族独立运动在不断高涨。他说：

这二十五年来，新的世界大战没有发生，原因之一的确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一场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害怕打。两个超级大国都在争取核优势，越争取开支就越大。尼克松在联合国提到美苏四个共同点^{〔13〕}的时候，有两点就跟这个问题有关。继续搞军备竞赛，增加军事费用，垄断资本当然有利可图。但是结果怎样呢？只能使困难加剧，或者发动战争。如果发动核战争，自己的劳动力要损失，对方的劳动力也要损失。结果是剥削

的对象少了，市场也小了。所以只能收缩，不能扩张。另一方面就是限制核竞赛，减少军事开支，至少停止增加。美苏核谈判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他们自己也说，这不是几年能解决的。双方总想赢一手，以便取得优势，于是也就互不信任。所以军事开支还是减少不了，还会增加。军事开支增加，经济建设投资减少，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过去发生经济危机有两种办法对付：一是紧缩经济，结果是失业增加，经济危机加剧。二是战争，但是核战争又不好打。怎么办？那就打局部战争。所以二十五年来局部战争没有断。二次大战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打了三年半。那是一次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国民党先后动员了八百万军队，我们到后来增加到三百万。结果是美国失掉了中国。接着就是朝鲜战争^[84]，美国动员了联合国十几个成员国参战^[85]，最后还是不得不停战。美国人自己也说，那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拉丁美洲的问题很多，那是美国的后院，美国投资很大。苏联想插手，美国一凶，它就撤走了。在一九六二年，苏联本来可以叫美国从土耳其和以色列也撤走火箭部队，土耳其又是北大西洋公约^[86]成员，但是它不敢。

另一方面，美国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基地遍及全球，局部战争没有停。在印度支那，如果美国的局部战争不停，战争会扩大。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

转移的。但战争扩大不一定是世界大战，仍然是局部战争。原因是大国不敢发动核战争。中东搞了三年，问题还要继续发展。

在局部战争中，只要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完全可以取胜。中国胜利了，古巴也独立了。在朝鲜至少可以算是将美帝打回到三八线⁽⁸⁷⁾。印支三国如不发生别的情况，最终也将取得胜利。我们同印支三国的关系就是帮助它们，但不参加，除非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现在美国的空军有严格的命令，到距中国边界多少公里的地方就不能再前进。我们的工程兵和铁道兵在中越边境修公路和铁路，在老挝我们也修公路。美国很清楚地知道，但它就是不轰炸。象我们修建中巴两国之间的公路，美国也知道，但它也不提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只要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主，不听从超级大国的指挥，不论美国或苏联的干涉，都是要失败的。这样的国家虽然一时会遇到困难，但最终会胜利。现在世界的形势是两个超级大国自己找不到出路。尼克松上任两年，他的政策不断摇摆，说话不算数。苏联要解决经济困难，但解决不了。毛主席在五月二十日的庄严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在这里，革命是广义的，包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这是更主要的。例如，拉美十多个国家发表声明，宣布二百

海里内的捕鱼权，不许美国渔船入侵，进来就抓，这就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革命行动。它们扣了一二百条美国渔船，美国政府不得不从国库中拿钱交给渔业公司，由它们赎回这些船只。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会议上提出各国领海为十二海里，并提出水深超过二百米的海洋为公海，拉美国家不接受，它们也没办法。所以关键是依靠自己。如果全世界各国不分大小，都是依靠自己力量为主，抵抗超级大国的压迫、干涉和侵略，世界形势就会更好。许多国家同中国建交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个证明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建立了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受到柬埔寨人民的拥护。他们纷纷起来开展武装斗争。在不到十天之内就有近二十个国家承认，二十五年来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二次大战时，法西斯德国占领了法国，卖国贼贝当成立傀儡政府。戴高乐在伦敦成立革命委员会，没有几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大国，但是开始也没有几个国家承认，不用说十天，就是一年也没有很多国家承认。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而柬埔寨不到十天就有近二十个国家承认了，这说明时代变了。

二次大战后，许多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了民族独立国家。开始的时候，新殖民主义还起作用。现在经济上的新殖民主义仍然存在。但是民族独立运动正在一天天高涨，新殖民主义的作用正在一天天减弱。现在一些发达国家以武装力量作为

后盾，要用新殖民主义的办法实行经济扩张。这种做法不合时代的潮流，就连它们本国人民的觉悟也在提高，不断起来反对他们。所以，看起来世界形势是紧张的，但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势是在高涨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四月初，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比赛结束后，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的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谈话时，当代表团成员格伦·科恩（以下简称科）说：“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总理对目前在美国青年中流行很广泛的‘嬉皮士’运动有什么评论？有什么看法？我很想了解这些。”周恩来回答说：

第一，我对这个运动不很清楚。第二，如果要问的话，我只能说一点我的粗浅的、表面的观察。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求真理的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检验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别好奇。别的国家的青年来访问时，我们发现他们不一定和你们同一派，但是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形式，比如留长头发，等等。我碰到过

英国青年也有留长发的，碰到过日本青年也有这样情况的。

科⁽³⁸⁾：对，总理先生。这些表现形式是许多日子思索的结果，它比表面上看到的更深刻。这是一种新的思想，没有很多人熟悉它，可能有少数人熟悉。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我只能回答这些了。

科：同意。

周：补充一句话，如果自己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改。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这是我们的认识。作为朋友，我们所以有这个建议。

科：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即进步只能从变化和精神发展中得到。

周：精神只有变成物质的力量才能前进，只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才行，因为总是需要有大多数人赞成嘛。这是一个规律，我这是讲哲学了。

科：谢谢。

周：乒乓里也是有哲学的。我看你打得不错嘛。

科：也许可以打得更好一点。

周：祝你进步。

科：谢谢。

周：讲到哲学，我又把毛主席的话拿出来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的实践精神，也是我们的理论指导。

美国朋友刚才都已经谈了。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罗德里克先生，你打开了门了。

约翰·罗德里克^[89]：谢谢你，总理先生。我首先感谢你邀请美国记者访华。美国记者访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中断，终于实现了。同时我赞成你刚才的说法，我们的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如果我们两国间有更好的谅解，这新的一页将更加美好。我希望通过记者的报道，这种关系会得到改善。

周：谢谢你的好意。

一九七一年八月七日，周恩来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谈话时指出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对外政策。他说：

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一九六七年的事情，这件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发生这个事

件的原因，边界问题关系不是太大。至于你访问美国，当时可能引起了一些议论，但在我的脑子里印象也不太深。

你知道一九六七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你们新大使来后可能知道一些。一九六七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甸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

当时我国政府想把这件事尽量约束在政府交涉的范围之内。开始我国使馆有一份抗议照会送给了贵国外交部，我记得照会中提出了五点要求。接着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支持抗议照会的要求。《人民日报》就这件事刊登了一些文章和消息。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们担心会发生象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护住了，没有发生象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七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种事也被我挡住了。运动发展到八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了，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

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一个是要冲缅甸驻华使馆，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两件事都有坏人，他们想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

另外，那时我们驻外使馆也出现过一种情况，就是对重大政治问题直接对外发照会。我们使馆给你们外交部发抗议照会不经过我国外交部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查清到底有几个照会是未经外交部批准就送到你们外交部的，可能从你们的档案中可以找到。大概从一九六七年七月起，有些重要照会就由大使馆直接送出，当然上面一定是盖了大使馆印的。你知道，那时我们的大使回来了，原来还要回去，六月底发生事情以后，我们才决定不让他回去了。

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当时我国在缅甸的专家虽然没有事做，但还留在那里，要看一看形势的变化。事态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到了一九六七年十月，你们通知我们的专家回国。十一月初，我们的专家都撤了回来。这样关系就搞得更紧张了。去年五一节，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请你们代办转达对阁下的问候。阁下在这个时期也采取了主动。这样，情况就转过来了。

我所以要说这一段情况，是想说明我们政府的

政策是明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发现以后，坏作用就起不了了。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仅同缅甸、英国有，同其他国家也有，我就不详细说了。如果有功夫，另找机会谈文化大革命情况时，我们可以多说一点。

对我们两国的关系，我们一直采取控制的措施，后来阁下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所以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没有走得很远。这对于在近两年促进和逐步恢复两国关系有好处，比较有利。

一九六七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年轻人、侨民有爱国心，他们学我们国内的样子去做，当然就不合适了。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万隆会议⁽²⁰⁾以后，我们对华侨和侨民所在的国家都宣布，侨民应该服从所在国的法令，不应该违反所在国的法令，要按照所在国的习惯生活和工作，因为你是住在人家的国家嘛。有些中国血统的人，在所在国已经住了好几代，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应该放弃中国的国籍，不应该保留双重国籍，我们不赞成双重国籍。万隆会议期间，我们同

印尼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我们向亚洲、非洲和欧洲许多国家申明了同样的原则。现在我们同美洲一些国家建立了联系，这个原则同样适用。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日，周恩来会见日本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等和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访华代表团的谈话时指出，日本必须承认台湾已经归还中国。他说：

中日之间存在一个台湾问题。刚才阁下谈到恢复日中邦交的三点前提⁽⁹¹⁾，阁下谈了事实，我还想再谈一谈，就是内容和条件的问题。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联合国已经通过了嘛⁽⁹²⁾！代表中国的不是蒋介石集团，他窃据了二十二年。代表中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形势变了。所以，昨天派了一个代表团，第一次派了代表团到联合国去，大张旗鼓地送他们去。日本的佐藤政府、美国政府都把调子降低了，说代表中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我们认为，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不够，还要说台湾已经归还它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阁下是搞历史的，您很清楚，台湾自古就属于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只是因为甲午战争⁽⁹³⁾，中国被日本打败，才被日本割去。就象库页岛南部在日俄战争中被日本割去

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罗宣言⁽⁹⁴⁾和波茨坦宣言⁽⁹⁵⁾都说日本要放弃过去占领的地方。南库页岛放弃了，过去把中国的东北说成是“满洲国”，也放弃了，朝鲜也放弃了，台湾也放弃了，在日本方面来说是放弃了。这些地方都已归还它们的祖国。虽然苏联没有和日本签订和约，但是南库页岛还是归还苏联了。没有哪个说南库页岛地位未定嘛！朝鲜现在还是一分为二，但总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属于日本，分裂了还是一个国家，是独立的。台湾在一九四五年已经归还中国了。当时中国派行政长官陈仪、参谋长葛敬恩到台湾受降，日本当时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受降文件上签了字。受降以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要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美国派第七舰队侵占台湾和台湾海峡，台湾早被中国人民解放了。杜鲁门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初，也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宣布美国对台湾没有野心。所以现在的问题，即第二个问题，必须承认台湾已经归还中国了。

现在世界上有一股逆流，说“台湾地位未定”，就是说，那个地方还有可能独立或者民族自决，这等于说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种分裂思想在帝国主义者的头脑中是存在的。英国是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就有这种思想。英国政府曾经同我们说到这种程度，即它可以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甚至于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说明一旦

换文签字，马上把在台湾淡水保留的领事馆撤回去。但是，英国政府要求保留这么一句话，即如果英国的议会或者新闻界问到它对“台湾地位未定”这个论断改变没改变，回答说没有改变。这不是从简单的逻辑上都站不住吗？矛盾嘛！你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又说“台湾地位未定”，哪有这样的道理！既然没理由这样搞，还要坚持这一点，那为什么呢？表面上说，英国政府在国会说过的话不好否定，这是骗人的。张伯伦在慕尼黑签订的条约^[96]，丘吉尔^[97]就否定了嘛！英国政府为什么现在还要保留这个立场？它自己说不提倡，它大概没有这个力量提倡。所以，它说人家发表这个主张，它不积极支持，那也是因为它现在没有这个力量。但它还要保持这个立场干什么？就是为适应美日的这股逆流，鼓动台湾独立。台独分子在东京活动，您很清楚，在横滨也有活动，在纽约、在旧金山也都有活动，还不断有人从台湾跑到日本去。蒋介石没有死，他也不赞成台湾独立。蒋介石八十五岁了，总有一天不在。台独分子就是要搞台湾独立。现在联合国就有人说，蒋介石用中国的名义不能进联合国，如果用台湾的名义可以到联合国去。这个谬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在世界各地都还有市场。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台湾问题，台湾究竟归还没归还祖国，地位定没定。比如说，有人要搞琉球独立，我们就不支持，

你们当然也不会赞成，一定坚决反对。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宴会上致祝酒词时指出，中美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他说：

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国家客人们表示欢迎。

同时，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

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

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中国政府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公开声明⁽¹⁰⁾，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这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方针。我们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在来华前的讲话中也谈到，“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欢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宴会上致祝酒词时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他说：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阁下应邀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我们感到高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对田中首相以及其他日本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

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最近几年来，每年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人数超过其他国家朋友，中国同日本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贸易额也高过其他国家。这就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首相阁下，你来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恢复中日邦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将为

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扩大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致意，并衷心祝愿日本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今天，中日两国领导人已开始就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谈。我们期望，我们的会谈将取得圆满的成功。

一九七三年二月三日，周恩来给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写信，强调第三世界国家要自主地发展民族独立经济。他说：

中智两国同是发展中的国家，对于智利现在面临的困难，我们很能理解并给予深切的同情。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是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留下的恶果。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遇到类似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发展中的国家除了相互帮助外，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如果经济不能立足国内，过多依靠外援，特别是依靠大国的贷款，这是很危险的。在这方面，一些国家有过沉痛

的经验教训。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要自主地发展民族独立经济，就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牺牲。相信我们的人民都是勇敢勤劳的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干涉、赢得自己的独立幸福的生活，他们会懂得如何清醒地估计局势，勇于接受面临的挑战。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形势下，更要考虑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局面；作两手准备，争取好的，准备坏的。总之，改变经济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只有结合现实的条件和可能，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才能逐步实现。这是我们从中国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的一点体会。我们对智利的情况很不了解，但是，作为老朋友，出于关切，我愿坦率地同阁下交换看法，供彼此参考。

两年来，智利政府和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帝反殖、发展民族经济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我们表示钦佩。相信智利政府和人民，在阁下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坚持斗争，进行充分的准备，谋而后动，就一定能够克服目前遇到的暂时困难，取得新的胜利，继续前进。

我们为两年来中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感到高兴，我们今后将竭尽自己的努力，使这种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五、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的同时，时刻关心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他说：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定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

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梁进珍辑述）

注 释

- 〔1〕曹山（一八九九—一九七二），江西吉安人。一九三九年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一九五二年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一九五七年时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一九六六年时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
- 〔2〕宋庆龄（一八九三—一九八一），广东文昌人。一九三六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写信，邀她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同年八月二十八日，宋庆龄由代表中共中央专程前往迎接她的邓颖超陪同，到达北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一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年九月十八日，她在北京参加“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授奖典礼，并将所获奖金十万卢布全部献出，用以发展中国儿童和妇女的福利事业。一九六六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县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革命活动家。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从九江去上海组织总政治部分部，四月十四日到达上海。他目睹了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九江、安庆的反革命事件。三月三十一日在南昌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周恩来任副部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一九四五年去职。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月曾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赴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的工作，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发动内战的阴谋，并拒绝参

加国民党一手包办召开的国民大会。一九四九年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一九五二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六年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一九五八年时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一九六六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章士钊（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洋军阀控制下的中华民国北京中央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程潜（一八八二—一九六八），湖南醴陵人。原国民党元老和高级将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先后任攻鄂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等职。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八年二月兼任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主席。一九四六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主任。一九四九年八月在湖南宣布起义，后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广东南海人，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画家，廖仲恺夫人。早年加入同盟会，随同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辞去国民政府的一切职务，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主席。

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临猗人。皖南事变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政府华北

“剿总”总司令、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职。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

张治中（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安徽巢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政府湖南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等职。一九四六年任国民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代表国民政府参加国共谈判的军事三人小组。一九四九年任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北平进行谈判，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为国民政府拒绝后，张留住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

邵力子（一八八二—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一九三六年时任国民政府陕西省政府主席。一九三八年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四五年时是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和参加政协及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一九四九年作为国民政府和平代表团成员参加国共和谈，后留北平未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蒋光鼐（一八八七—一九六七），字憬然，广东东莞人。曾任国民政府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一九三二年与蔡廷锴等指挥十九路军进行淞沪抗战。一九四六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蔡廷锴（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字贤初，广东罗定人。

一九二九年时任国民政府军第六十师师长。后曾任国民政府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十九军军长。一九三二年参加指挥淞沪抗战。一九三三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一九四六年春与李济深、何香凝等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沙千里（一九〇一—一九八二），上海人。一九六六年时任粮食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张翼若（一八八九—一九七三），陕西朝邑（今大荔）人。爱国民主人士。从抗日战争后期起，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积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

〔3〕副委员长，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副主席，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政副，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副，指国务院副总理；两高，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4〕**李宗仁**（一八九一—一九六九），广西临桂人，原为国民党桂系首领。一九三六年曾参与发动两广事变，反对蒋介石。一九三八年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国民政府安徽省政府主席。一九四八年四月任国民政府副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任代总统。国民党政权崩溃后去美国。一九六五年七月回到北京。

〔5〕指宋庆龄和她的弟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及姐姐宋蔼龄、妹妹宋美龄。

〔6〕**陶铸**（一九〇八—一九六九），湖南祁阳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后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一九六七年一月起被监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纠正过去对陶铸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 〔7〕**李任之**（一九一九—一九八三），广东东莞人。一九六六年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
- 〔8〕**刘澜涛**，一九一〇年生，陕西米脂人。“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九三一年，刘澜涛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判刑后监禁在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九三六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党中央批准，决定被捕同志履行手续后出反省院。这样出反省院的共有刘澜涛等六十一人。对此，中央早已有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江青伙同林彪等人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到处支持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揪斗这批老党员。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错误地将这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为这一大错案进行了平反。
- 〔9〕九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 〔10〕**王恩茂**，一九一三年生，江西永新人。一九六九年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 〔11〕**徐海东**（一九〇〇—一九七〇），湖北大悟人。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一九六九年时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
- 〔12〕**邓初民**（一八八九—一九八一），湖北石首人。一九六九年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 〔13〕**华罗庚**（一九一〇—一九八五），江苏金坛人，数学家。一九七〇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

- 〔14〕西尧，即刘西尧，一九一六年生，湖南长沙人。一九七〇年时是周恩来总理派往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一九七二年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 〔15〕“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以贯彻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关于党政机关干部也要学农、学工的指示为名，把干部集中下放劳动的场所称为“五七”干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它对一大批干部进行劳动惩罚和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 〔16〕工、军宣队，即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派往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领导学校工作的工作队。
- 〔17〕戚本禹，一九三一年生，山东威海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被关押。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 〔18〕张霖之（一九〇八—一九六七），河北南宫人。一九五七年起，任煤炭工业部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
- 〔19〕刘建章，一九一〇年生，河北景县人。一九五四年起任铁道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关押。
- 〔20〕先念，即李先念，一九〇九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七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 〔21〕登奎，即纪登奎（一九二三—一九八八），山西武乡人。一九七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八〇年二月前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同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纪登奎等的辞职

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 〔22〕 **萧华**（一九一六一—一九八五），江西兴国人。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时任中共中央辽东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一九四八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一九五二年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六四年起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被关押。
- 〔23〕 **李力群**，一九二一年生，江苏宿迁人。一九七四年时是国务院科教组工作人员。
- 〔24〕 **侯宝林**，一九一七年生，北京人，相声表演艺术家。“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被批判、斗争。
- 〔25〕 **高震**（一八八七—一九七八），浙江绍兴人，国民党元老。抗战胜利后，由于不满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和反动统治，一九四九年辞去了国民政府驻日本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留居日本。一九七四年九月正在国内参观访问。
- 〔26〕 **刘志坚**，一九一二年生，湖南平江人。一九五七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被关押。
- 〔27〕 **齐燕铭**（一九〇七—一九七八），北京人。一九四四年时在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任科长。一九七四年时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秘书长。一九五二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一九六〇年起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一九六六年夏至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被隔离审查。
- 〔28〕 **卫立煌**（一八九七—一九六〇），安徽合肥人，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九三七年十月忻口战役时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十一月升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解放战争后期，担任国民政府军东北“剿总”总司令，因没有积极执

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被软禁于南京。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引退后去香港。一九五五年三月回到北京，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 〔29〕张学铭（一九〇六一—一九八三），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胞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被关押。
- 〔30〕张学良，一九〇一年生，字汉卿，辽宁海城人。东北军爱国将领。一九三五年十月起任国民政府军西北“剿总”副司令。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邀周恩来到肤施（今延安），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以及双方通商和互派代表等问题进行谈判。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蒋介石长期关押。
- 〔31〕张学思（一九一六一—一九七〇），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胞弟。曾任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一九六七年起被关押。
- 〔32〕吕案解案，即吕正操专案和解方专案。这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残酷迫害曾在东北军和东北各界工作过的吕正操、解方、刘澜波、张学思、万毅、阎宝航、高崇民、贾陶等人而蓄谋制造的一个所谓“东北叛党集团”的假案。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曾受到株连。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案子得到彻底平反。
- 〔33〕廖志高，一九一三年生，四川冕宁人。一九六六年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 〔34〕富春，即李富春（一九〇〇—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一九六七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35〕先念，即李先念，见注〔20〕。

- 〔36〕**剑英**，即**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一九六七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七九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 〔37〕**萧华**，见注〔22〕。
- 〔38〕**成武**，即**杨成武**，一九一四年生，福建长汀人。一九六七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
- 〔39〕**谷牧**，一九一四年生，山东荣成人。一九六五年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一九七八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 〔40〕**秋里**，即**余秋里**，一九一四年生，江西吉安人。一九六七年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七二年时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九七九年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 〔41〕**支左**，指在“文化大革命”中派人民解放军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群众，是“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一个方面。这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 〔42〕《六六通令》，指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令》，提出“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 〔43〕**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六四年起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 〔44〕**曾思玉**，一九一一年生，江西信丰人。一九七〇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

- 〔45〕刘丰，一九一五年生，河南渑池人。一九七〇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
- 〔46〕长办，指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 〔47〕先念，即李先念，见注〔20〕。
- 〔48〕登奎，即纪登奎，见注〔21〕。
- 〔49〕德生，即李德生，一九一六年生，河南光山县李家凹（今属新县）人。一九七一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 〔50〕张体学（一九一五—一九七三），河南新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省长。一九七〇年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 〔51〕林一山，一九一一年生，山东文登人。一九七〇年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
- 〔52〕毛泽东主席在看了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后写了以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 〔53〕秋里，即余秋里，见注〔48〕。
- 〔54〕剑英，即叶剑英，见注〔36〕。
- 〔55〕长汽、二汽、重汽、南汽，指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长春）、第二汽车制造厂（在湖北十堰）、重庆汽车分公司和南京汽车制造厂。
- 〔56〕“九一三”，指九一三事件，即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事件。
- 〔57〕九大，见注〔9〕。
- 〔58〕地方五小工业，是我国地方小型厂矿的统称。六十年代一般是指小钢铁厂、小煤矿、小电站、小化肥厂、小机械厂，后来又包括小水泥厂等。

- 【59】四个一样，是对当时在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做法的概括说法，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 【60】王云五（一八八八—一九七九），原籍广东中山，生于上海。他首先将四角号码检字法运用于字典。一九四六年后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一九四九年去香港，一九五一年去台湾。
- 【61】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前期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一八八三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先后发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论著，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
- 【62】顾颉刚（一八九三—一九八〇），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一九五九年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63】吴庆彤，一九二四年生，河北蠡县人。一九七二年时是国务院办公厅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办公室核心小组副组长。
- 【64】剑、春、德，指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张春桥、李德生当时是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
- 【65】“五七”干校，见注〔15〕。
- 【66】文裕，即张文裕，一九一〇年生，福建惠安人。一九七二年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副所长。
- 【67】指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一部张文裕等十八位科学工作者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这封信反映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情况，提出了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

- 〔68〕郭老，即郭沫若，见注〔2〕。
- 〔69〕西尧，即刘西尧，见注〔14〕。
- 〔70〕指物理学家萨拉姆教授，当时是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一九七二年九月五日，周恩来在和他谈话中，强调了自然科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 〔71〕指一九七二年四月四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一部提出的关于发展高能物理方向任务的请示报告。
- 〔72〕朱光亚，一九二四年生，湖北武汉人。一九七二年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 〔73〕王冶秋（一九〇九—一九八七），安徽霍丘人。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八六年，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
- 〔74〕指当时湖南医学院要求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尸体进行解剖，以便写出关于尸体医学研究的全面科学报告；同时要求有关单位在对尸体内脏组织进行病理鉴定、审查等方面给予协助，后来，通过这次解剖获得了珍贵的科学资料。
- 〔75〕廖静文，一九二三年生，湖南长沙人。徐悲鸿夫人。一九五七年起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
- 〔76〕指一九七三年七月六日廖静文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信中提出要求恢复徐悲鸿纪念馆的问题（参见本文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六日周恩来致吴庆彤并转吴德信）。新的徐悲鸿纪念馆一九八二年底建成，一九八三年一月底开始对外开放。
- 〔77〕吴庆彤，见注〔63〕。
- 〔78〕吴德，一九一三年生，河北丰润人。一九七三年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一九八〇年二月前，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吴德等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

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79〕 廖静文，见注〔75〕。

〔80〕 悲鸿，即徐悲鸿（一八九五—一九五三），江苏宜兴人。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81〕 王冶秋，见注〔73〕。

〔82〕 余湛，一九二一年生，湖北英山人。一九七三年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83〕 美国总统尼克松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美国和苏联之间尽管存在深刻分歧，但有四大因素可以作为减少分歧共同合作的基础。这四点：双方都不要核战争；双方都欢迎减少军事开支；双方都希望增加贸易和商业接触；双方都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挑战。

〔84〕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85〕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组织了英国、

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联邦、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希腊、菲律宾、泰国、哥伦比亚，连美国在内共计十六个国家的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

〔86〕北大西洋公约，简称“北约”，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葡萄牙、加拿大、丹麦、挪威、冰岛等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实行“集体防御”；任何缔约国同他国发生战争时，必须给予援助，包括使用武力。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条约生效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先后设在伦敦、巴黎，一九六七年迁到布鲁塞尔。土耳其和希腊于一九五二年，联邦德国于一九五五年，西班牙于一九八二年，先后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

〔87〕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商定在朝鲜国土上以北纬38°线作为两国接受日本投降的临时分界线，分界线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这条线通称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时，朝鲜人民已在这条线以北地区建立了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条线以南地区是在美帝国主义扶植的李承晚集团统治下。

〔88〕科，即格伦·科恩，美国圣莫尼卡市立学院学生，男子乒乓球运动员，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四月初参加第三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代表团成员。

〔89〕约翰·罗德里克，一九七一年时是美联社驻东京记者。

〔90〕万隆会议，即亚非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

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

- 〔91〕美浓部亮吉谈到的恢复日中邦交的三点前提是：第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第三，表示废除“日台条约”的愿望。
- 〔92〕指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联合国是一九四五年建立的国际组织，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二十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一直被剥夺。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上述提案后，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席位从此得到恢复。
- 〔93〕甲午战争，是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随即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中国方面在陆上和海上都遭到失败，被迫于一八九五年签订了《马关条约》。
- 〔94〕开罗宣言，即《开罗会议宣言》。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以及击败日本后如何处置日本的问题。十二月一日发表了该宣言。主要内容是：三国对日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夺取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把日本从它用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所有土地上驱逐出去；使朝鲜自由独立；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
- 〔95〕波茨坦宣言，即《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也

称《波茨坦公告》。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波茨坦会议通过并发表，同年八月八日苏联正式加入。宣言主要内容是：盟国对日作战直到它停止抵抗为止，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日本军队要完全解除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远铲除；日本战犯将交付审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必须消除；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

〔96〕指慕尼黑协定，即《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会议时签订。这个协定是英、法两国企图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换取希特勒东进侵略苏联而签订的。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及同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其余领土由英、法、德、意“保证”不再受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国的军事威胁和英、法的压力下，接受了这个协定。在英、法绥靖政策纵容下，德国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并于同年九月一日进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此后，“慕尼黑”便成了为自私目的而牺牲他国利益、纵容侵略行为的代名词。

〔97〕丘吉尔（一八七四—一九六五），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一九三八年曾强烈反对张伯伦推行的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提出过联苏制德的主张。一九四〇年出任首相，领导战时联合内阁。一九五一年再次任保守党政府首相。一九五五年四月退休。

〔98〕指周恩来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

题。”这个声明，是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的缅甸、锡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的代表团团长在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举行会议，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就台湾地区局势问题发表的声明，刊载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緬懷周恩來總理

回忆敬爱的周总理（节选）*

谷 牧

九

全党团结一致，是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的。经过三年调整，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1963年下半年，国民经济情况明显好转，并有了新的发展。

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弦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越绷越紧，“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阶级斗争的重点开始转向党内。在1964年11月中央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就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以后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提出要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如邓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所指出的：

“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

* 该文原载于《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全文共十九部分，本书略去一至八，只收入了有关“文革”的部分，仍用原文名。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对于“文化大革命”，在运动初期，党内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都处于一种“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是如此。我体会，包括周总理和少奇同志等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他们也是在一种很不自觉的情况下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去的，他们也是在凭着自己的认识看问题；凭着自己的经验干事情，凭着自己的责任感做工作。他们的思想和肩上的担子都是沉重的。周总理作为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是必须贯彻执行的。所以，无论是同我们这些人谈话，或者公开对群众讲话，他总是讲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势”。但是，“文革”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的发展是个什么结局？他也搞不太清楚。比如他在8月份就向毛主席请示，并得到批准，提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运动到10月中旬告一段落，就可以说明他当时对“文革”的认识。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我觉得有两条原则总理是抓得紧紧的：一条是，反复强调执行政策，对于当时运动已经出现的混乱现象，他一经发现，就挺身而出，积极加以纠正。记得1966年7月8日，他在听取国务院各口汇报“文革”情况时，曾明确指出：“给人家戴‘黑帮’帽子，又要靠人家工作，这种作法不好。组织结论不能轻易做。”他还强调：“被批判的对象，不下放，也不外送，一般留在机关监督改造。”另一条是，在重大问题上经常向毛主席报告请示，争取毛主席的支持或者首肯，运用毛主席的权威，对运动做一些矫枉和引导工作。在“文革”初期，总理为了将运动纳入我党传统的轨道，维护党和国家

机器的正常运转，缩小对生产建设的冲击和破坏，作了极大的努力。当然后来运动的发展实际，使他的良苦用心完全付诸东流了。

对于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这一类言辞，周总理也是听不顺、看不惯的。在7月2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总理曾说，对于这些提法，他同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认为这些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

我们这些人，在这一段已经受到了大字报的“炮轰”，但都在背着“十字架”兢兢业业地工作。关于三线建设和基建工程兵问题，中央书记处由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由周总理主持，都听过我们的汇报。我还就西南铁路前线指挥部存在的一些问题，于7月7日专门向总理汇报过，他表示完全支持我的意见。那天下午，总理还在各口汇报“文革”情况的会议上宣布：“三线建设与一、二线不同，不能受文革的影响。”在那一段时间里，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都还能保持运转，周总理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而且他已经看出这场运动可能给经济建设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抓得比以前更紧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文革”进一步推向了高潮。这次会上，毛主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少奇同志，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简称十六条）；中央人事也作了很大变动，林彪成了接班人，少奇同志在中央常委中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8月13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大叫大嚷：“文化革命要搞他几个月，大触每个

人的灵魂，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睡不好觉，让任何单位都滑不掉、漏不掉！”8月18日，毛主席身着戎装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彪也登台亮相讲话，“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在全国范围内铺天盖地而来。

十

这年9月初，经李富春同志提议，毛主席批准，余秋里同志和我被通知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每人分管十个部。

周总理当时最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他经常找我们了解经济工作方面的重大情况和问题。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握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对于我们每天汇总的生产报表，他都要仔细审看。哪个铁路局的货运量掉下去了，哪个煤矿的产量降低了，哪种产品的原料供应不上了，他都要认真查问原因，并和我们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那年的8、9、10三个月，是学生们的来京“大串连”的高潮阶段，给铁路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为了维持起码的铁路运输秩序，保证起码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周总理要我们花些力量，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多次指示我们：“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

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9月12日，总理还亲自给我打过电话，要我给他整理一份铁路货运情况的材料。10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决定10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连一个月，再闹几个回合，要求我们按进出北京的学生各150～170万人的盘子安排运力。我找到总理叫苦说：“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情况很紧张，进出北京各150万人很难安排。”总理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送常委讨论决定。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10月7日，我找了铁道部负责同志，整整用了一个上午才勉强搞出了运输学生170万、150万、120万三个方案，报给了总理。为了保证铁路交通运输，总理还在9月底要我突击起草一个不得随便干扰铁路、航运秩序的通知稿。

十 一

这期间，“文革”的风浪已经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工矿企业。国家机关中，也闹起了群众组织，与社会上的红卫兵相呼应。学生冲击机关的事件不断发生。8月25日，就有建工学院和琉璃河水泥厂的200多人包围建材部，揪斗赖际发部长，罚站罚跪，还动了手。9月中旬，有两派学生组织进驻了国家经委，分别支持经委的两派群众组织，互相争斗，严重干扰了国家经委的正常工作。我们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总理和富春、先念同志。他们立即研究，并

指派我去处理此事，说服两派学生都退出经委大楼。说服工作相当难做。两派学生开始都不买帐，后来我不得不说“这是总理和富春同志的命令”，两派学生才同意退出机关。后来，我就此事的处理情况给他们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学生不能到工厂搞串连，更不能进驻各部委机关，干扰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周总理在此报告上批示：“坚持不让学校革命师生进入部、委设联络站，但可派联络员经常到部、委取连系。周恩来九·十六。”他完全支持了我们提出的意见，之所以要加上“可派联络员经常到部、委取连系”这句话，显然是为了敷衍那个形势，以使我们的主要意见能得以通过，于大局有利。

也是在此前后，北京国棉一厂两派组织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随时都有酿成“武斗”的危险。9月15日深夜，总理在一份《快讯》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十分不安，马上打电话找我。我当时刚刚入睡。电话铃声一响，我即醒来，马上披衣去接，一听是他的声音，忙说：“总理，这么晚了，您还没有休息啊！”他说：“一大堆事情缠着，睡不下啊！刚才看到一个消息，是北京国棉一厂的……”他谈了大致情况，要我抓紧处理好这件事。我当时考虑，现已深夜，再找部长们不太方便，便回答说：“总理，我明天一上班，就抓紧处理好此事，请您放心！”他说：“好！”通完电话后，我就睡下了。出乎我意料的是，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就在案头上见到了他的批示：“谷牧同志：方才看了这张快讯，我已来不及等你明天处理了。我已直接打电话给钱之光，请他于今夜立即找焦善民，要他负责处理此事，而且必须解除对少数派的围攻。并告钱，今早向

你汇报。周恩来九·十六，二时。”看罢批示，我深深为总理对人民的极端爱护和负责的精神所感动，纺织厂的工人，不管这派那派，毕竟都是工人群众啊，总理深怕延误一夜，酿出更大的事端；我又十分愧疚：这件事本应由我连夜处理，无须麻烦日理万机的总理再加过问，但结果还是麻烦了他。直到今天，我每想起此事，心里仍深感不安。

十二

如果说，1966年8月份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把“文革”推向高潮的第二个大动作（第一个是《五一六通知》的发出），那么，这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则是第三个大动作。在这次会议上，所谓“刘邓司令部”的问题提出来了，少奇、小平同志被迫在会上作检查，失去了作为中央常委的实际权力。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经过几个月的经营，此时攫取了实际领导权。“文革”运动的底牌到此揭开了，周总理的处境益发困难了。

记得就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们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向他汇报过经济建设遭受严重干扰的情况，并请示了一些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当时他双眉紧蹙，严肃地说：“你们提的问题我都认真听了，但需要中央常委研究才能定下来！”一听此话，我们就明白了形势的严峻。令人钦佩的是，就是在这种困难境地中，周总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仍然努力发挥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种“中和作用”和“减少损失的作用”。

在这一段时日里，哪里发生了武斗、打砸抢事件，总理就派联络员去调查，进行干预处理。哪位部长被揪斗了，总理

就指示有关同志和我采取措施加以保护。10月29日，国家经委副主任陶鲁笪同志的办公室被造反派砸开，抢走了一部分文件。我们于夜里12点报告总理，他当即明确地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将国家经委过去的文件档案全部集中起来，由国务院加封条，非经国务院批准，任何人不准擅动。为了使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工作不致遭到更大挫折，总理更是付出了巨大努力。在他的讲话和他组织起草的文件中，总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这在当时是谁也不能反对的。我记得11月9日，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时，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的重要性，严肃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坚持按他的意见定稿，并决定社论稿翌日立即见报。

那时，林、江一伙对此当然是十分恼火和怀恨的，他们公开污蔑周总理是“救火队长”，污蔑我们这些人是“救火队员”。王力在一次会上攻击说，工人闹革命的高潮，被“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和其他有关文件压制下去了。稍后一些时候，戚本禹等人更加明目张胆地攻击说：“文革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面对这些污蔑和攻击，总理岿然屹立，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本色。

当时，总理是抱着什么心情对待那场动乱和浩劫的？他有一段震撼人心的话，一直铭记在我心中。那是在1966年11月19日下午，总理来到我主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同大家见面并作了长篇讲话。他对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大家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善于因势利导，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我不

入苦海谁入苦海”！这是总理的伟大心声，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崇高实践。敬爱的周总理晚年，不正是在“苦海”中度过过的吗？他自己被迫入了“苦海”，心里仍然时刻惦记着同人“苦海”的广大干部和亿万同胞，日日夜夜操劳着为这些人们分忧解难。

十 三

说到这次工交座谈会，工交《十五条》的始末是不能不说的。此前，总理曾找余秋里同志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人，一个抓计划会议，一个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后一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11月13日中午，陈伯达把他们“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稿给了我，要我们在一周之内提出意见。11月14日上午，总理召开各口碰头会，我把此事向他作了报告。我说，原来就想把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广州的同志和各大区管工业的同志找来，商量一下工交系统的“文革”问题，现在陈伯达他们既已搞出了一个文件，能否开一个工交座谈会商量一下。总理表示同意，会期定在16日到20日。

会议期间，同志们对陈伯达一伙的稿子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问题，都表示反对。于是，我们就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总精神，除此之外，还对原稿作了一些增删合并，增加了以下三条实质性的内容：（1）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

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3）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第15条就是一句话：“此文件精神也适用于财贸系统。”这是按照当时主管财贸口工作的姚依林同志的意见加上的，依林同志一再说：“你的列车上一定要多挂一个车皮，把财贸捎上。”

11月21日上午，定下了修改稿的架子。下午5时，陈伯达打电话要我和余秋里同志立即去他那儿。秋里有事迟到，我先到了。陈伯达一见面，就拿出一本线装书，怒气冲冲地要我读读他指定的一段话。我一看题目，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要我读的那段文字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意思是，写文章的，搞历史的，研究天文的，是类似算命打卦一类的下九流人物，本来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戏弄、被娼妓戏子所豢养、被社会习惯势力所轻视的。我一想，不知是什么地方把这位大人物得罪了，在未明白是怎么回事时，还是沉默为好。陈伯达见我不作声，就问：“这篇文章你过去读过没有？”我说：“读过。”陈伯达接着就大发牢骚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我这才明白，他之所以发火，是因为我们改了他们搞的《十二条》。我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上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他仍忿忿不平，说了许多蛮横不讲理的话。我们看解释也没有用，就退出来了。

我们回到中南海后，就径直去找周总理。总理正在听宋任穷同志汇报东北局的工作，我们就插进来谈了刚才的情况，又谈了我们所以要作那些修改的理由。总理说：“没有这么严重吧！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

11月22日上午，我同林乎加、杜星垣等同志一起，商定了进一步修改稿子的方案。午间，参加了总理、陶铸、富春同志主持开的碰头会，并在会上汇报了昨日下午到陈伯达那里的情况。晚上10点我接到富春同志电话，说我汇报的情况，他和总理已经报告了主席，主席指示：（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4）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我们提出的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的意见。有了这个底，我们放心了一些。第二天上午，我即把修改后的稿子批印上报。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12月4日林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张春桥则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在12月6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地站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

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就这样，我挨了三个半天的批。

令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个半天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他们（指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总理的这些话，实际上是为我们开脱责任。

12月9日下午，周总理又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碰头会，研究工交座谈会精神如何传达，此事如何处理。我表态说：“如决定把《十五条》发下去公开批判，我没意见，但希望不要把与《十五条》无关的一些事扯上。”（因为王力在会上发言攻击了陶铸同志，说工交座谈会是受了陶铸同志的影响。）坐在我身旁的聂帅，望了望我，慢悠悠地讲了一段斗争艺术很强的话：“我以为不宜传达，不宜公开批判。谷牧的错误，仅是一次没有形成后果的错误，不过是改了改稿子嘛！外面并不知道。如公开批判，观点就会流传，就会干扰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后果值得考虑！”聂帅讲完后，叶帅等老同志立即表示赞同。“文革小组”那几个人虽然强词夺理地继续叫嚣了几句，但也说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于是，周总理拍板决定：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

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

十 四

《十五条》的风波暂时过去以后，我于12月28日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在出差途中，除了看报纸外，我几乎每天深夜都要到大街上去看一次大字报。陶铸同志被点名批判的消息，上海“一月夺权”事件，我都是从大字报上最先看到的。我意识到，“文革”是越闹越邪了。在此期间，国家建委机关的造反派还给我发来几份“通牒”，要我立即“滚回北京”接受批判，声称如再不回去，就要派人来把我揪回去。但是，我仍然坚持完成了任务，于1967年1月30日中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一下飞机，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一群不相识的人迎面走来，态度十分蛮横，要我交出手中的公文包，上他们的车。我抓紧公文包不放，站着不动。于是，上来两个彪形大汉，从左右两边把我一挟，推上了他们的小汽车。此情此景，使我油然想起1936年春天在北京做地下工作时被绑架的情景，那次也是两个高大的警察，一左一右把我挟上他们的囚车。不同的是，那一次上的是卡车，这次上的是小汽车，阔气多了。还有，那一次是夜里，这一次是白天。当时我想，我真的能再一次进北京的监狱吗？

我回京后即被造反派绑架的消息，周总理很快就知道了。他派出联络员找建委机关造反派谈判，说定在第二天只批判一场，即把我送回中南海，他要听我的出差汇报。造反派不得不同意了，这是因为象我这样的当权派，机关内外的各种造反派都要抢着批斗，万一被别的派抢走了，他们是要

承担一些责任的。就这样，我在第二天被他们批斗了5个小时后，造反派头头亲自押送我到中南海北门放下。总理已让人给我在中南海假山院子的东面安排了间房子，与余秋里同志为邻。当晚，富春、先念同志都来安慰我，我向他们谈了出差观感。这个地方，成了以后一年多我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场所。在那年春节前后，总理几乎是天天找我们开会，研究通过了关于停止学生徒步串连的文件，研究了三线职工不能向一线跑等等问题。

过不几天，即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由于我和余秋里同志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小伙计”和“帮凶”，打那以后，我们抓工作就更困难了。社会上对我们的批判不断“升温”，而我们需要做的事却越来越多，最紧迫的是铁路、交通问题。3月21日，周总理通知我，根据3月19日毛主席关于“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的批示精神，立即研究拟出一个对铁、交、邮三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3月26日清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通知我，统计一下铁、交、邮三部军管需要派遣的解放军人数；通知交通部的某些直属单位可以先行军管，说六个对外港口批准军管的电话稿已经批发了。我们起草的对铁、交、邮三部实行军管的文件，在政治局碰头会上讨论时，由周总

客、货车受阻的消息接连传来。周总理十分担忧，一面抓紧实施先行军管铁、交两部的具体方案，一面让我研究起草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命令及军管铁、交两部的决定。5月31日，郑州、徐州、金华都同时发生铁路阻塞事件，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周总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于中午亲到毛主席处，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的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总理的这些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下午，总理召集富春、先念、叶帅、秋里等同志和我开会，传达了向毛主席汇报的情况，并一起商定了如下一些具体对策：（1）尽快公开发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运输的命令；（2）将全国十八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船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3）参加军管的军队人员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铁路、轮船运输的管理，免受干扰；（4）责成总参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实施计划，次日拿出方案。这些决策，后来均付诸实施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铁、交两部实行军管，对铁路全线和沿海沿江航运实行军管包干，对于挽救国民经济危局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十 五

周总理在“文革”动乱中的另一个卓越贡献，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党内外老干部，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改朝换代”的阴谋难以得逞。这方面的事太多了。可以说，幸存的或逝世的我们党、政、军各方面的大批老干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他的关怀和保护。在“文革”初期，是周总理

亲自拟定了一份党内老干部和民主人士的重点保护名单；是周总理亲自拟定了不准随意改变被批斗干部工资的电报稿；在揪斗部长风潮最甚之时，又是周总理制定了让被斗部长轮流进中南海休息的制度；执行中遇到造反派阻挠时，他总是亲自派联络员前去交涉，使得部长们在紧张的工作和频繁的被揪斗中，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70年代初期，又是周总理借着农机部部长陈正人同志突发心脏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不幸逝世的事件，商请毛主席同意，恢复了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制度；“李震事件”出来后，周总理又做工作，实行了部长级以上干部的警卫制度……这些，党内外许多老同志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了，我在这里只讲两件我亲身经历的、迄今人们不大知晓的事情。

一件是1966年9月22日，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同志听传达说“炮打司令部”到10月中旬告一段落，十分高兴，由于过度兴奋，当晚突发脑血栓，昏迷不醒，危在旦夕。我于9月23日上午去看过他，并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9月25日晚上又去看他，总理也来了，当时在场的还有刘澜波、吕正操、段君毅等八位部长。望着奄奄一息的志远同志，总理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八大尚书’都在这里，能不能从外地再请位专家来会诊呢？”我们说，上海、四川都有治疗这种病的高手，但眼下这个时刻，谁能有办法啊！总理说：“派专机也要接来嘛！”我们说，那只有您能下这个决心了。总理真的做到了，连夜从上海调来了两位医生，第二天四川的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进行了精心抢救，可是由于为时已晚，志远同志还是逝世了。但这件事给了家属和我们这些人以极大的温暖，大家的心与总理贴得更紧了。

另一件事是，1966年底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被造反派武斗和逼供致死。周总理有一天接见群众时，眼里含着泪水，手里拿着霖之遍体伤痕的遗体照片，悲愤地说：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叫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的是无法无天了……看着他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我们无不为之动容。此后不久，周总理即主持搞了一个不得对被批斗干部进行体罚的规定。

至于我自己，在那些岁月里如果不是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967年春节以后，造反派对我的批斗升级。我每次被拉出去，总理都要派个联络员跟着，并让联络员预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让别派抢走。有了这些“约法”，我挨斗时的处境要稍好一些，但又有哪个造反派是真听话的？！说是批两个钟头，往往是四、五个钟头，挨骂不说，有时还要被揪头发，扭臂膀，水当然更是喝不上一口了。等回到中南海，浑身就象散了架，喉咙干得冒火，连饭也咽不下。富春同志看在眼里，在一次国务院会上提出：“谷牧一星期出去几次，身体受不了，而且也贻误工作，改为一星期出去一次成不成？”总理说：“什么一次两次？不出去了。今后出去，必须经我批准。”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出去挨斗的次数确实少了很多。

在那阴霾蔽日的年代里，周总理是云层中透出来的亮光，是维护花草树木少受风暴摧折的大树，是全国人民寄托希望和寻求慰藉之所在。正如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

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十 六

我是在1968年春季离开中南海，回建委机关接受进一步“审查”的。

1967年4、5月间，我们一边挨着批斗，一边协助总理抓经济工作，外面造反派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日渐升温，先是“走资派”、“三反分子”，后是“招降纳叛”、“反党篡军”，到5月31日，也就是周总理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关于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具体部署的那一天，满街贴满了“打倒大叛徒谷牧”的大字报。

我1936年在北平“左联”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过，敌人在审讯中抓不到我是共产党员的具体证据，最后把我具保释放了。这段历史，党早已审查清楚。但到了“文革”中大抓“叛徒”的年代，又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为此，周总理亲自找我谈过话。我说：“这已是老问题了，让他们查吧。”总理说：“已决定从×××专案组中抽出两个人突击查一下你的问题。你不必背什么包袱，还要象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叛徒”的问题未了，“特务”的问题又出来了。造反派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档案里，查出解放战争初期给特务发饷的名单上有一个少校，与我原名相同，仅仅是三个字，

既无年龄，也无籍贯和经历。造反派把这张名单拍了照，交给中央审查，同时，在大街小巷贴出“打倒大特务谷牧”的大字报。

“叛徒”、“特务”这两顶大帽子一扣在我头上，我就很难再出面工作了。造反派在中南海北门外搭起帐篷，打起“揪谷兵团”的旗号，安营扎寨，夜间也在狂呼口号，闹得住在中南海里面的人昼夜不得安宁。我出面主持开会也很难有什么效果了。记得有一次，周总理让我找铁道、交通两部抓业务的同志研究交通问题，就有人拒绝出席，声称不能和“大叛徒、大特务”坐在一起，说是这样做，就成了“叛徒、特务主持开会，走资派参加（影射国务院业务组的其他成员），军管会执行的局面，那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所谓“叛徒”问题由于以前查过，现在再查也容易搞清，还不至于置我于绝处，那么，所谓“特务”这个新鲜问题由于一时很难查实，就使我陷入十分艰难的境地了。我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又勉强做了一段工作。后来，富春同志找我谈话说，总理和他商量了多次，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再出面工作；这样长期地与群众对立下去，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叛徒”、“特务”问题，经过这一段审查，已大体弄清楚了，群众要查让他们继续查去。另外，建委机关实行军管后，秩序已得到控制。因此，他和总理的意见是：让我回机关去，与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审查。为此，他们已向建委军管会作了交代，相信我回去以后，不会发生什么大问题。我当然完全理解他们的苦衷，表示一定要“正确对待”，愿意到群众中去接受审查和批判。富春同志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相信你会正确对待的。总理还让我

转告诉你，自己要珍重，要经得起磨炼！”我点着头，记在心里。临离开中南海的前两天晚上，先念同志来看我，他义愤地说：“你当时不是当华东局秘书长吗？管着机要，如果你是特务，华东战场的胜仗还怎么打？”又说：“堂堂的共产党华东局秘书长，怎么才当了个国民党少校特务？真是奇谈怪论！”在这以后长达两年的“牛棚”生活中，正是总理和富春、先念等同志的这些话，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使我在艰难困苦中没有泯灭希望之火。

直到1969年下半年，所谓“特务”问题才算彻底搞清楚了。专案人员总算找到了那个与我原名相同的国民党少校特务的小老婆，证实那个人是比我年岁大得多的河南人，是与我完全无关的另一个人，这才宣布我的历史问题查清楚了。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我总算获得了“解放”。但就在这时，林彪又发出要老干部“疏散”到远离北京的地方的所谓“一号命令”。

我也属于“疏散人员”之列，建委军代表亲自到周总理那里汇报“疏散”我的方案，提出让我到江西干校去。总理说：“干校不要去了。谷牧同志对三线建设感兴趣，基建工程兵他也参与组建过，让他到基建工程兵部队去搞些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一旦有事，还可以带部队去前方服务。”就这样，我后来到四川江油和泯江紫光铺工地的基建工程兵部队里当了半年兵，又在江汉油田当了半年工人。直到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时，我才奉调回北京参加批判。

1971、1972年，在我没有正式恢复工作之前，周总理让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当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的顾问，忙了一、两个月；一是让我抓抓港口建设。后一个题目是在林

彪自我爆炸后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定的。那次会议，通知我也去参加。我到了会议厅时，周总理已坐在那里了。这是我自1968年搬出国务院后第一次见到总理，心情很激动，急忙上前与他握手，他也紧紧握住我的手。我见他瘦得厉害，就说：“几年未见，想不到您瘦成这样！”总理说：“你想我能不瘦吗？”是的，总理能不瘦吗？！“文革”闹了这么多年，他日夜操劳，其中辛苦，国人皆知。所幸的是，人间自有正气在，“文革”中的那些跳梁小丑，或折戟沉沙，原形毕露；或多行不义，狰狞日现。而总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却更加崇高。就在这次会议上，总理宣布：“谷牧同志在没有正式分配工作之前，我们让他抓一抓港口建设问题。”他站在很高的角度，讲了搞好港口建设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要我和粟裕同志一起组织一个小班子，深入搞些调查研究，提出港口建设计划，争取三年改变港口面貌。

1973年春天，我恢复了建委主任的职务。再一次见到周总理时，他显得更加瘦弱了。我问候他的病情，他说：“你还不知道吗？我已经得了癌症了！”我心情突震，惊愕万分。他遂换了一个话题说：“你恢复工作了，担子很重，还得好好干呐！现在不是时兴‘爬坡’、‘拉车’那些话吗？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犹存，就得奋斗！”听了他的话，我十分难过，也很激动。周总理已经知道自己身患不治之症，每时每刻想到的还是国家和人民，还在勉励我们为国家和人民“拉车”，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啊！那以后不久，他就住院治疗了。我们只能从一些文件上，看到他的批示；从电视广播报纸里，听到他会见

外宾的消息，看到他瘦弱的身体和坚毅的风采……

十 七

在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我再一次见到了周总理。此前，“四人帮”妄图四届人大由他们“组阁”的阴谋遭到了毛主席的训斥。周总理带病主持了这次中央全会的几场主要活动。在这次全会上，正式选举邓小平同志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讨论通过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1月18日晚上8点，四届人大的新闻公报及人事名单发表，周总理继续担任总理，小平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

1975年2月1日下午，周总理先是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谈了国务院各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了，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他又主持召开了各部部长都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他和小平同志都讲了话。记得那一次会议开始前，我还将带去的一本从旧书店中买到的有周总理亲笔签名的书，送给总理看。他笑着说：“谢谢你啊，你把这本书给我收回来了！”他问我这本书是从哪儿买到的，我说是在琉璃厂。他说：“琉璃厂很有名气，可不能毁掉！”北京市后来搞的琉璃厂文化街修建工程，就是按照他的遗愿进行的。

自那天以后，我就很少见到周总理了。周总理的一些指示，我们是从小平、先念同志那里听到的。1975年4月27日上午9时，先念同志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先念同志说：“今天早晨6点，总理把我找去，谈了很

长时间，他要我转告你：在抓紧港口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抓机场的建设，海运空运，我们都很落后。”我懂得这些都是总理十分关心和重视的大事，都及时作了部署安排。

1975年是个不平凡的年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叱咤风云的革命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刀阔斧、有声有色地全面整顿“文革”留下的烂摊子，在饱受“文革”煎熬的神州大地上吹起了一阵春风，全国人民又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四人帮”对此恨之人骨，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宣传舆论工具不断制造舆论，到年底就精心策划了一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国的天空上又乌云翻滚了。人们凭着多年动乱悟得的经验，体察到这股阴风的矛头所指，都在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他的亲密战友邓小平同志担心……

十 八

刚过1976年元旦，就传来了周总理病危的消息。

1月6日半夜12点，王震同志来到我家，向我谈了总理病危的情况，还谈到一些当时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忧心如焚。王老说：“明天准许我们去探望总理，我们一同去！”送走了王老，我在凛冽的寒风中伫立很久，感到政治气氛和自然气候一样严酷。当晚，我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将近一年没有看到总理，现在让我们探望，必是大厦将倾。总理啊！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多么希望您活着啊！全国人民又多么希望您活着啊！您不能走啊！

1月7日上午9时半，王老和我一起去看总理，走到总理的病床前，见他已昏迷不省，面容憔悴，胡子很长。王老

看到这种情景，就悲痛地转身去找医生询问情况。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他身边呆呆地站着，期望他能睁开眼睛和我说上一句话，但已经不可能了。良久，我实在忍不住，哭出声来，走了出去……

1月8日上午，一颗伟大的、赤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敬爱的周总理永远离开了我们。

1月9日早晨，广播里传出总理逝世的讣告。我在哭泣，我们一家人在哭泣，整个北京城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1月10日下午4时，我去瞻仰周总理的遗容，同他作最后的诀别，从1938年第一次见到他到此时，整整38年了。

1月12日上午，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总理守灵，接待外国使团的吊唁，不少外宾也泪水盈眶，有的女外宾还哭出声来……

那几天，天安门广场上哀乐低迴。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的青年人满含泪水，肃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总理献花圈，开追悼会，彻夜不散。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使他们变得更成熟了……

1月12日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当时的感受：“一个政治家在世界上声誉如此之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印象如此之深，他的逝世引起的反应如此之强烈，古今中外能有几人？”

1月15日下午，我们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会。当小平同志在致悼词时说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我们的总理感到深切悲痛时，全场一片哭声。追悼会后，总理的灵车前往八宝山途中，十里长街两侧，几十万群众冒着严寒，伫立迎

送，哭声不绝，人类历史上有过这种场面吗？！

十 九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总理逝世后不到 8 个月，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虽然“四人帮”对此进行了残酷镇压，但那也只是加快了他们自掘坟墓的进程。

总理逝世后不到 9 个月，党中央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揭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这位为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屡建丰功的人，不会忘记这位人民共和国的建筑大师，不会忘记这位在三年困难时期指挥若定、力挽狂澜的人，不会忘记这位在“文革”动乱极其复杂的历史情况下，竭尽全部精力，发挥高超才智，力使新中国航船免遭沉没之危的人，不会忘记这位把整个身心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心心相印的好总理……

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老兵，我更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协助他工作的日日夜夜，不会忘记他的关怀、支持、勉励与批评，不会忘记38年间他所给予我的谆谆教诲，不会忘记他用自己一生的言行构筑起来的高尚品质和伟大风范……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 对我的关怀与保护

谭 启 龙

在十年动乱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斗争错综复杂、自身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地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每当我读到这方面的回忆文章时，内心深处便涌起对周总理深深的敬重与怀念。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从受冲击，被打倒，到重新工作的大约十年时间里，周总理曾三次指示把我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我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同志对我采取保护性措施。如果没有总理的保护以及许多同志的帮助，在无法无天的运动冲击下我能否生存下来，能否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一些工作是很难预料的。

1966年夏秋之交，西安发生了学生与工人冲突事件。青岛市三所大专院校的部分学生要求赴西安声援，他们不仅不听市委劝阻，反而冲击市委，批斗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引起工人不满。8月25日双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是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确定由我带领调查组前去处理。行前我向周总理电话请示，他同意由我亲

自出面处理，做好双方的工作，并指示“不准冲击市委。打干部不对，要制止”。我于27日到青岛，经过三天调查处理，事态有所缓和。我即返回济南向省委汇报。但是紧接着，学生大规模批斗张敬涛等一批干部，工人们看不下去，两边又冲突起来，而且愈演愈烈，如不及时做好工作，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可能。于是我再次去青岛。这一次虽做了许多工作，但这边的工作刚有眉目，那边又闹了起来，反反复复。隐约间我发现似乎有人在暗中策动崂山县农民进城，火上浇油。在此紧张气氛中，我向周总理报告说，以省委名义已很难开展工作。总理考虑为便于开展工作以及保证我的安全，电话指示要我“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名义出面做好双方的工作”。我按照总理指示穿上军服，继续做双方工作，同时向毛主席、党中央发电报力主不要让农民进城，要回乡抓革命促生产。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快做了批复，并通报各省、市、自治区。这样，到了9月初，紧张形势得到缓和，制止了流血事件发生。

谁料一波稍平一波又起。1966年11月初，学生要求参加省委为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劝阻无效，学生冲击会场，并押我上北京，这就是济南的“一一·三”事件。同去的有许多学生，中途在德州停下等待获准进京，第三天才到北京。接待站安排我和红卫兵住在国家经委礼堂。刚住下红卫兵即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1）要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2）要求在京游行（即游街）；（3）要求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对此，周总理作了明确答复：（1）10万人大会不能开；（2）游行不能搞；（3）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陶铸、谭震

林同志按照总理指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会议商定在国家经委礼堂开一个“批判反动路线大会”，陶铸、谭震林同志指示不准武斗，要谢华同志在场做监督，并明确指出，“谭启龙同志我们了解，没有什么大问题，是个好同志”。会后有的红卫兵见了我也称起“同志”来了。这次事件，在周总理、陶铸、谭震林等中央首长的直接干预下平息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往后的事愈演愈烈，在一片“火烧”、“炮轰”中，省委已不能进行正常工作。12月18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造反派把我及省委调查组主要成员押往青岛。他们的策略是一面把我困在青岛，一面组织力量去济南夺全省大权。这样，我便在青岛一直被关到1967年2月3日。2月7日我被押回济南，向“革命委员会”履行“报到”手续。此后，我被关押在山东医学院的教学楼，睡了两夜的课桌。第三天晚上10点钟，杨得志司令员派人来接我，车开到军区五所，未做停留，当即换车直达飞机场。这时，来接我的军人才告诉我：“周总理打电话给杨司令，指示把你从造反派那里接出来，负责护送到飞机场。明天早晨7点派飞机来接你。”接着安排在机场就餐、洗澡。次日晨7时，飞机准点起飞。到京后，我住进了京西宾馆九楼的套间。

在京西宾馆由中办工作人员负责与我们这一批各大区及各省、市、自治区被保护在北京的部分书记的联络工作，例如送文件、看病、通知亲属探望等等，时间长达两年之久。

当时，江华、江渭清、张体学等同志已被接来北京。不久，叶飞、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也陆续来了，都住在九楼。我们这些老同志碰在一起，就互相摆龙门阵，“交流”

戴高帽子、坐喷气式的“经验”。其间，李先念、谭震林等领导同志来看望我们。谭震林同志还详细地询问我们挨斗的情况，并说他要向毛主席打个报告。后来这篇报告竟被“四人帮”诬为“二月逆流”的一条“罪状”。

王效禹为了把我要回山东进行批斗，耍花招欺骗周总理说，山东开了一个很好的会，地委书记、厅局长都参加了，有一部分干部能解放出来，希望叫启龙同志回去听听意见，做个检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967年4月24日下午4点多，电话听筒里传来周总理亲切而清晰的声音：“是启龙同志吗？有个事同你商量。王效禹提出，山东省革委正召开地市委书记及厅局长会议，要求你回去参加这个会议，听取意见，亮亮相，你看怎么样，能去吧？”我立即回答总理：“我回去没有问题，听中央决定。”总理听后说：“那好，你去吧。有什么困难？”我略思索一会，想到回去之后，难以预料会发生什么事，心中升起渴望见总理一面的念头，于是说：“别的没什么，只是要求走之前能约个时间见见您，哪怕5分钟也行。”总理当即回答：“那可以，晚上12点到我家里来。”放下话筒，内心激动不安，一会儿想见到总理该谈些什么呢？得有个准备；一会儿又想起全国夺权浪潮汹涌，局面很乱，总理日理万机，要抓生产，要保护老干部，又要应付造反派无休止的纠缠，这时去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太不应该了。

深夜12点，我准时到达周总理住处——中南海西花厅时，总理还未回来。见到邓颖超大姐略谈一会，待邓大姐去休息了，我继续等待。凌晨两点，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后回来了，看上去很累。握手问候后，总理问我的身体和年

龄，我回答53岁，身体还好。总理说，“那好啊，你还可以工作20年”。总理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时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原打算明年搞出个眉目，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很难说，要有长时间的精神准备。原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比民主革命能少花一点代价，现在看来不一定。

接着总理便谈干部问题。他说，全国干部问题还解决不了，站不出来。据王效禹讲山东形势很好，你去听一听也有好处，对于解决干部出来工作的问题，山东做法也可能是一条路子。他还讲，这几年华东形势不错，工农业生产搞得比较好，对国家贡献大。原来设想华东干部出来工作好解决一点，现在看也不行。

回去以后怎么办？总理交代主要是听取意见，不要随便表态，不要讲自己的成绩，先否定自己，多做些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有错误，成绩让别人讲。他举例说，有位同志做检查，摆了自己很多成绩，效果就不好。

总理对我怎样回去也做了具体安排。他告诉我：“我已通知王效禹，明天早上你和王效禹、杨得志同志坐同一架飞机回济南。我已交代他们回去后只准提意见、批判，不准搞武斗，不要围攻。”

谈着谈着，两个小时过去了，时针已指向凌晨4点，窗外天色已微微泛白。为了让总理早些休息，我赶紧告辞。总理送我到客厅门口，我请他留步。但总理却说他还要到院子里走一走。总理与我一起穿过院子，一直送我到门口。临上车前，他握着我的手又交代了一句：“回去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杨得志同志写条子。”

总理看着我上了车。车子启动了，透过车窗还看得见总

理伫立着的身影。破晓前的夜色笼罩着他的全身，使我感受到他双肩承受着的那种沉重压力。

两天后，我怀着一颗沉甸甸的心飞回济南。

杨得志同志因军委开会没有返济，我与王效禹同机。一下飞机，早已布置好的8辆大卡车押送我游街到南郊宾馆，下车后即逼我下跪批斗。当晚又在南郊宾馆俱乐部开批斗大会，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开完大会从会场回住处，一路拖了我几百米，不断有拳脚偷袭过来，我的肋骨被打伤。从此之后，大小会批斗天天不断，甚至三五人闯入我的房间，扭住便斗。这种行动后来被革委会的军队代表闻知，出面制止才略有收敛。

批斗持续到5月初。由于王效禹等人忙于策划所谓“冲击省革委会”事件，挑动派性斗争，负责我安全的同志，才设法把我转入省立第一医院休息了20几天。由于形势很乱，安全没有保证。他们商量后，与中办同志通了电话，报告了我在济南的情况。几天后，回电话说，经请示总理，同意谭启龙同志返回北京。

当时，被保护在京的地方负责干部大约有20余人，已由京西宾馆迁至中直招待所。住在里面的老同志可以看文件、报纸，有的由子女或秘书陪伴，可以串门子，互相往来与交谈。

我住进中直招待所不久，该住处就受到红卫兵两次冲击。一次是四川造反派“红卫兵成都部队”冲进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杨超等四川领导同志劫走。总理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一个加强连从中南海赶来加强守卫并与造

反派交涉，令他们立即放人。另一次是武汉事件爆发后，所谓“北航红旗”越墙冲进院内，把张体学、张平化、叶飞同志劫去批斗。当晚总理令其立即放回，并指示剩下的人转移到中南海暂住一夜。第二天我们回到中直招待所，当天夜间有车带我们在北京城里兜了几个大圈子后转移到一个秘密地点。从那时起，除了有关同志照顾我们的身体和传递信息之外，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了。与我同室住的老同志先后有王其美、程子华、黄火青同志。有一次我发烧去中南海医院看病，才知道我们的住地是南苑机场办公楼。我在南苑机场住了三个多月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康生及王、关、戚对我的问题一再升温，并向周总理施加压力，再次要我回省接受批斗。

我回济南前，总理派人向我转达，只去两周时间，东西不要带回去。并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斗。然而，王效禹大耍两面派，当面答应总理，回到济南，对我批斗更凶了。除了大会批斗之外，小会轮番斗，不时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间饱以拳脚。我终于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床上不能平卧，只能长时间地趴着，经常呕吐黄水。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决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体斗垮”。那时大会小会批斗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进小房间殴打，万一发生不测，造反派反咬一口说“畏罪自杀”，就什么事都说不清了。因此我下决心一定要向周总理报告。

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我与大儿子见了一面，要他代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通过中办同志转交给周总理。

这封信很快到了总理手中。总理读后，即打电话给王效禹，责问为什么打我。当王抵赖时，总理严厉地批评了他。

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又当面批评他：“你们不按我交代的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为了确保我的人身安全，总理具体指示杨得志同志派部队保护我，杨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个班对我监护。每次批斗时，均有两个战士陪同，站的时间长了，战士拿个凳子让我坐着听。由于总理有了明确的指示，杨司令等军区领导坚决执行，在战士的具体保护下，武斗被制止了。此后，在济南重点大企业、大专院校及省级召开的各系统批斗会上，没有再发生武斗。

但是，王效禹仍以“态度不好，群众通不过”为由，拒不放我回北京。同时，背地里加紧追查是谁向总理报告的。在查不清的情况下，给我扣了一顶“诬告造反派”的大帽子。从此，我一直被关押在山东。直到1968年12月毛主席、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再一次提到我之后，王效禹无法向党交代，才不得不对我解除隔离，转移到南郊宾馆，开始允许亲属探望，一直到“九大”召开。

回想这一段经历，如果不是周总理出面制止并指示杨司令派部队对我监护，武斗的事态发展下去，我能否活到现在，确实是难以预料的。在这一时期，许多同志在困难的处境下帮助我，也是令我难以忘怀的。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之际，我注视着大会的进程。4月24日夜，广播了“九大”主席团新闻公告及九届中委名单。在候补中委的一长串名单中，居然听到了我的名子，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那天晚上，我怀着一种惊讶、兴奋加上各种问号的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彻夜难眠。毛主席、周总理的各种指示与

他们的形象交织在一起，一幕幕地呈现在眼前。

过了一天，党中央派飞机先到南京接张才千同志，再路过济南接我去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会后，在五一节晚上观礼时，我被周总理带到天安门城楼休息厅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主席、总理都问：“你身体好吗？”我回答，感谢主席、总理的关怀。后来，决定我留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

当时被保护在京的各地老干部已分散进入8341部队主管的“六厂二校”。在新华印刷厂我见到了杨尚奎、霍士廉等同志。叶剑英元帅也不时来厂里劳动，见到我还关照“今后可以到我那里去看文件”。邓颖超大姐也每周来厂一次。她每次来厂都来看望我，并带来了周总理的关怀。邓大姐是1932年我在瑞金马列学院时的老师，所以见面时我常称她为“老师”。她要我将在厂里学习、劳动的体会写下来，呈送给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报告一共写了三个。每次邓大姐都转告我，总理看了报告，很高兴，并且鼓励我“再来一个”。有一次，大姐问起我爱人的情况，得知她尚未“解放”，仍在农场劳动后，报告了总理。在总理的关怀下，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向杨得志同志询问，杨司令很快组织人进行复查“解放”，并派人送她来北京。

1970年6月份，总理约我去谈分配工作的问题。总理首先询问了我在工厂的情况。当他听说我爱人已来到北京住在中直招待所，我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来往于工厂与招待所之间，认路、买票已不成问题时，总理爽朗地大笑，说道：“你现在自由了，要是在济南就没有这么自由。”接着总理说：“现在有三个地方要你去：一个是山东杨得志、袁升平

要你回去；一个是河南省；还有一个福建韩先楚同志也要求你去工作。主席说，不回山东了，换个地方好，考虑到韩先楚同志要求很迫切，决定你到福建去协助他工作。”同时还具体指示：（1）看文件；（2）检查身体；（3）离厂前与工人开个座谈会。我照办了。座谈会开得很融洽，许多工人师傅都流了泪。军宣队、厂党委将工人座谈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总理看了很高兴，说：“评价不错。”

这样，我便被分配去福建省担任省委副书记、省革委副主任。走之前，邓颖超大姐到中直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赠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并说：“坚持就是胜利。”

依依惜别总理、大姐，转向南下征途。我反复回想着总理的指示及大姐的赠言，决心把它当做指引我一生的座右铭，决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

（原载《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

历史的功勋

——周恩来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进程

王 立 邱盛云

1972年2月21日，中午11时半，一架蓝白色的美国总统坐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总理走向停机坪，站在舷梯下迎接前来访问的尼克松总统。当两位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时，无数个照相机和电视摄像机镜头对准他们，记录下了这一震撼世界的外交事件：一位美国总统专程到长期相互敌对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今天，当我们回顾打开中美关系的这一段历史进程时，特别怀念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了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当然也想到尼克松先生和基辛格博士以及所有为此做出贡献的人们。正是由于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才使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其中，周总理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是任何人也不能代替的。他在制定和执行这一时期我国对美方针方面发挥了极大的创造性，在处理事关我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在策略问题上又显示了高度的灵活性。他那无产阶级外交家的非凡胆识和才华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抓住时机，打开两国交往的大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尽人皆知的历史原因，中美两国的关系和人民交往隔断了20多年。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对美国采取封锁、孤立、遏制和敌视的政策。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和美国上述政策的日益破产，70年代初出现了打开两国关系的历史性机会。当时身为我国外交政策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周总理，敏锐地抓住时机，协助毛主席作出了打开对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并亲自付诸实施，使两国进入了一个逐步加强接触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新时期。

早在1969年初，周总理就看到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苗头，指示有关部门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摸清美国的战略意图，探讨同美国接触的可能性。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总理的预见。

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多次表示要与中国接触，示意把改善中美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1969年2月1日，他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中苏珍宝岛事件后，美国于1969年7月宣布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接着，尼克松和基辛格利用出访亚洲、欧洲一些国家的机会，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安排，希望同中国对话。10月，美国通知中国，它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12月3日，在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使馆人员表示愿意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晤。

每当美国政府放出这些试探气球，中国方面都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周总理始终处于第一线。在当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中美两国国内以及国际上存在着种种反对中美接触的势力。由于多年的隔绝状态，双方互不了解。每天出现在两国报纸上的言论和政界人士的谈话仍然是互相敌对的。但周总理却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从美国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调中看出了某些细微的变化，并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魄力，同毛泽东主席一起，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冲破障碍，推动历史的前进。

作为恢复接触的第一步，中国政府同意美国大使会见中国驻波兰代办，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于1970年1月20日宣告恢复。美方在当日会谈中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中方表示：中国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这些会谈可以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此后不久，周总理又利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之机亲自表达了上述意向。

正当中美双方通过传递信息逐步走向高级接触时，发生了1970年3月美国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方基于一贯反对侵略扩张政策的立场，中止了同美国的联系。直到美军撤出柬埔寨并再次发出愿意打破美中关系僵局的信号时，双方的联系才又恢复。同年10月下旬，尼克松分别向正在访美的叶海亚总统和齐奥塞斯库总统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愿意派一个高级使节秘密访华。

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中国也作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姿态：是年国庆节，周总理请美国记者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身边，检阅国庆游行队伍。11月中、下旬，尼克松再次托人向中方传话，希望派特使访华。周总理作出答复，同意美国特使前来商谈解决台湾这个关键问题的办法。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斯诺，请他转告华盛顿：“如果尼克松到北京来，我愿意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毛主席还向斯诺阐述了“左、中、右都让来”的政策，指出要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就得同尼克松谈。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向尼克松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1971年4月，周总理又根据毛主席的决策，指示我有关部门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并亲自会见美国运动员和随行记者。“乒乓外交”“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正如他后来生动描述的那样，“小球转动了大球。”同年4月21日，周总理给美国政府一个口信，表示愿意接待美国特使例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交谈。尼克松于5月中旬答复说，他准备在北京同我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并建议由基辛格同周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中国同意这一建议的信件于6月2日转到白宫，基辛格立即送交尼克松。尼克松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两人当即决定把基辛格的中国之行称为“波罗行动”，以几百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探险”的壮举作比拟。

透彻分析形势，确定会谈方针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2月尼克松来访，是中美两国打开关系最初阶段所进行的高级外交谈判，事关此后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和全球的战略格局。为准备这两次谈判，周总理多次亲自主持会议，透彻分析国际形势和美国情况，反复讨论会谈方案，并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家庭生活，乃至爱好和习惯都作了研究。为此，他特地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等。基辛格访华前夕，尼克松在美国堪萨斯城发表讲话，承认战后25年世界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不再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除苏联的威胁外，美国面临西欧、日本的竞争，中国也是潜在的竞争者。与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美国已不能支配世界了，它不得不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尼克松特别提到，美国必须采取步骤结束与中国大陆隔绝的状态。周总理十分重视这篇讲话，当即要外交部印送有关领导同志参考，其后又多次引用尼克松的这些言论，用以分析美国的战略动向。他指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可一世，什么地方有事它都要过问。而现在却不同了。侵越战争不得人心。战场上打败仗，国内人民反战情绪强烈，迫使它不得不把军队往回撤。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下降了，政治地位更加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它要考虑，是继续在各方面出击呢，还是收缩一下？综观全局，它首先要解决的是印支问题，这是最急迫的。要解决印支问题，就要同中国打开关系，以改善它的被动地

位。周总理强调说，尼克松上台前后，我们一直观察了3年，看准了美国为解决亚洲问题不能不同中国接触。他认为，利用这一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将有利于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周总理主持制定了同美方会谈的方针，进行了部署，强调要原则坚定，策略灵活，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我立场，同时也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办法，争取谈判取得一些成果，以利改善关系，缓和局势。

纵论天下大事，寓论辩于说理之中

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期间，大部分时间是与周总理讨论国际重大问题和中美两国关系。由于双方立场各异，在很多问题上有过激烈交锋，但周总理总是以高度的谈判艺术，寓论辩于说理之中，使对方感到尽管意见不同，中方的立场是有道理的，中国领导人的话是可以信赖的。

在谈到改善中美关系时，美方曾表示不能迈出大的步子，不能放弃“老朋友”。周总理指出，美国在南越和柬埔寨支持的阮文绍、施里玛达等“老朋友”总是要被人民赶下去的。如果当年杜鲁门不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不以武力援助蒋介石，22年来的中美关系可能不同得多。问题是争取一代和平是寄希望于前进方面，还是寄希望于这些“老朋友”。把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希望放在这些人身上是不可能的。周总理还进一步以时代精神向美方晓以利害，指出：既然中美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必然要改变一些关系。中国有句俗话说，会掌舵的人引导航船迎着浪头上，不然将会被浪潮

淹没。有远见的人会懂得如何掌舵。如果所有的老关系一无更改，一切照旧，那怎么能迎接新时代呢？总之，时代在前进，懂得时代精神的人，会促使世界情况的改进，否则就要被时代的潮流所淹没。基辛格听后表示，相信我们经过了目前的谨慎时期后，一切关系都必然会发生变化。尼克松也表示，正如总理所说的，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世界变了，美中关系也必须改变。

关于总的国际形势，尼克松认为，如果美国退出，某些地区就会出现“真空”，就会为苏联提供钻空子的机会。这是战后美国推行扩张政策的一个重要借口。周总理批驳说，世界上不存在“真空”。早年美国有人曾说杜鲁门的政策丢了中国的六亿人口，历史证明，中国并没有成为“真空”，美国势力、苏联势力和蒋介石都走了，中国人民自己填补了这个“真空”。这同200年前美国人民在英国退走后自己填补了“真空”是一样的。这一席话说得对方只有连连点头。

印支问题是双方会谈的一个主题。周总理一再强调解决印支问题的迫切性，要美国采取果断行动，不要拖泥带水，不要留尾巴，应早日全部从印支撤军。他尖锐指出，印支人民在流血，而在台湾问题上中美没有打仗，因此应首先解决印支问题。中国对印支承担了义务，只要美国不停止战争，中国将坚决支援印支人民打到底，甚至不惜作出民族牺牲。他耐心说明，要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关键在于美国从越南和印支撤军。美国撤出得越早越好，越迟退出就越被动，反而使战争得不到尼克松所期望的“光荣结束”。为了说服对方，周总理几次举戴高乐将军退出阿尔及利亚为例，说戴高乐不但把80万法国军队撤回，最后甚至把200万侨民

都撤走了，赞扬戴是“有魄力的，很有眼光”的政治家。周总理还明确表示，中国一贯尊重印支各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干预他们的内政和对外政策，“我们只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预他们的权利”。只有印支人民有权同美国谈判，我们不能替代。周总理阐明的立场有力地支持、配合了越南人民同美国的斗争，打掉了美国企图要我向印支人民施加压力的幻想。

周总理在会谈中所表现的坚定的原则性和充分说理的谈话方式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十分钦佩。他们在回忆录中称道周总理有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但讲话彬彬有礼，入情人理，对形势和谈判对象了若指掌，对问题反应敏捷。中国人说话算数，这是周总理给他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正如基辛格所说，“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是“信守协议的”。基辛格还说，周恩来“对哲学的论证，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运用自如”，“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尼克松也说，周总理留给他的鲜明印象是无与伦比的品格和献身精神。他发现自己对中国人产生了好感。看来这些都对促进达成协议及双方信任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公报》——高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晶

周总理在同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会谈中，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又显示了必要的灵活性。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具体结合集中体现在中美双方1972年2月28日达成的《上海公报》中。

美方本来想发表一个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的公

报，以显示其中国之行的成果。中方不同意这样做，并提出了一个建议草案，既列出双方的共同点，也摆明双方的分歧所在。这使美方大感意外，认为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美国国内无法接受的。对此，周总理作了大量的耐心说服工作。他指出，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二十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会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也将会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周总理建议，公报允许双方阐明各自的原则立场。这种实事求是的真诚态度使美方难以拒绝。尼克松承认，一个星期之内不可能建立一座跨越16000英里和22年隔阂的桥梁。

就这样，经过双方反复讨论，一个独特的、别具风格的公报终于达成了。公报首先列出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包括对国际问题的各项原则主张。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军必须从台湾撤走，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活动。美方则声明，它认识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对于基辛格巧思所得的上述表达方式，周总理是很欣赏的。双方较快地取得了一致。但接下去谈到美确认从台湾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走美军的一段，用词颇费周折，最后的表述方式基本上肯定了美军全部撤走的最后目标，驳倒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为我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为

下一步实现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原则基础。但为了照顾美方国内的政治困难，我方也作了一定妥协，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而是先确定全部撤军的目标，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周总理正是根据上述策略思想，促使美方同意了公报的内容，我方的预想基本上实现了。

公报列举了双方的共同点，包括：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不应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双方准备在相互关系中实行上述原则等。把上述共同点写入公报，既照顾到美方的需要，也对美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在公报中还声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即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任何一方不拟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等。这些表明了我方光明磊落的立场，对消除有关国家的疑虑是有益的。

公报也写入了扩大双方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联系等内容，这对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和平外交路线的集中体现。自从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总理和缅甸总理于1954年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中国政府一直坚持把它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早在1955年亚非会

议期间，周总理就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发表了对美关系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此后，在中美大使级谈判过程中，中方也一直坚持把它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只是由于美方不愿意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而没有取得成果。

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讨论解决中美两国的分歧，是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和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期间双方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周总理一直坚持只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平等协商才能达成谅解。他在同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中就详细阐述了中方的这一立场，并表示：中美双方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寻求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通过追述美国敌视新中国的历史，周总理雄辩地指出，正是杜鲁门、杜勒斯等执行的反共反华、“两个中国”的政策造成了两国间的长期隔阂，也使美国陷入孤立处境。由于同样的原因，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举行了136次会议，但却未能解决两国间的根本问题。周总理还以苏联干涉中国内政造成中苏关系对抗为例，强调要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双方必须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于周总理的倡议和坚持，《上海公报》明文载入：双方同意，各国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里虽然未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词，但实质内容相同。也就是说，1955年以来中方在中美关系中一直主张的五项原则，终于在《上海公报》中得到确认。历史证明，五项原则是中美

关系得以健康发展的唯一可靠的基础。可以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越来越认识到周总理首先提出和倡导的这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它将日益为更多的国家所承认和接受。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但他在中美关系转折时期所立下的历史功勋将与世长存。记得他在同尼克松总统会谈时曾引用毛主席的“咏梅”诗，并作了意味深长的解释。他说，“首创的人，没有等到事业的成功，也就是看到别的花开的时候就谢了。”我们要有这样的精神：“你首创，但不一定能自己享受”，“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周总理虽然生前未能亲眼看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但正是他作为首创者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辞世后，中美双方沿着《上海公报》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进，并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此后，中美关系又走过了十年既有曲折又富有成果的历程。与十几年前相比，今天的国际局势和我国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周总理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实践中所体现的思想和风格至今仍有着巨大的教育意义。我们要以周总理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他所开创的优良外交传统，坚决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为世界的和平与合作，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和统一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原载《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

周恩来为人民抱病操劳记略

成也竞 力 平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这是对周恩来的公正评价。这里，仅根据周恩来当年的台历记载，从他的工作日，来叙述一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在1974年后，是怎样地带着不治之症，鞠躬尽瘁地为党为人民付出全部心血的。

1972年，周恩来得了癌症。他自己知道这个情况。党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劝他休息和全力进行治疗。安静地疗养和休息，早日痊愈，恢复健康，这是全国人民也是全党同志对他的希望。周恩来曾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自己感到疲乏。七十四岁高龄的他，何尝不想休息。但是，“文革”的现实使他不能够休息，对人民事业的责任感使他不考虑休息。他采取了相反的作法——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将有限的生命，完全倾注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彻底地贡献给国家和人民。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夹杂着批“周公”，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时候，正是周恩来病情越来越重，癌症显著发展的时候。他不顾“四人帮”的攻击和迫害，也不管自己病情的恶化，把全部力量用到了工作上。下面是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这天住进医院动手术）期间，除去进医院检查和病重休息的日子外，共139天中周恩来抱病工作的情况。

在这139天中，周恩来从起床起到睡眠止工作12小时以上、14小时以下的，有9天；工作14小时以上、18小时以下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小时的有38天；工作24小时左右的5天；工作近30小时的一次。其余的一些天，大多在五月间，从起床到睡眠之间只注明为休息、办公，未详办公时间多久。也就是说，在这139天中，七十六岁的周恩来抱病工作，一天工作18小时到24小时或超过24小时的有44天，占139天中的31.6%。其中，有些天是连续工作不间断的。例如，2月9日工作了20小时，10日起床后，一直工作到12日凌晨四时三刻。又如，5月6日，周恩来连续工作了18小时，刚睡40分钟，就被叫醒去钓鱼台。之后，只休息了3小时多，就一直工作到8日凌晨四时半，又是工作十多小时。3月6日，办公12小时后，他体力支持不住，躺倒了床上，但在床上又批看文件九个半小时。3月11日到医院检查病情，15日下午出院回家，当时就在床上看文件4小时。第二天，工作近13小时。他就是这样为党为民抱病操劳的。

1974年1月25日，“四人帮”召开所谓“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对周恩来发动突然袭击。大会后，他继续工作着。3月15日，他刚从医院检查病情出来，江青就要他17日去看所谓黑画展览，举办这个展览，矛头正是对着周恩来等人的。看

过以后，他又继续工作。从3月16日到5月底这两个半月里，周恩来除了日常工作外，还参加政治局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参加其他会议、听取汇报、找人谈话等共57次。⁶⁶体力实在支撑不住时，他就躺在床上继续工作，有时两三个小时，有时三四小时，更多的是四小时以上。其间，4月28日、5月19日、5月23日、5月25日，周恩来曾四次发生缺氧病状。直到病势严重，他才同意住医院动大手术，于6月1日住进医院。

在医院里，周恩来也没有能安静治疗，他还是为党的事业、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利益继续工作不息，“四人帮”也不断地干扰治疗。下面是从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这段时间内，周恩来抱病工作的状况。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共作过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计算，大体上每四十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身体还能够支持，周恩来就继续工作。1975年，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毛泽东支持下由邓小平主持了。但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仍旧处理工作问题，此外还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同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在接见外宾之前或之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中召开会议20次，离医院外出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他去参加了；李富春的追悼会，他去参加了；并且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当时，国内政治情况十分险恶，党、国家和人民都处于危难之中，唯其如此，周恩来才放不下心，坚持不懈地工作，直到最后。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所指出的，他努力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尽量减少因“文化大革命”这场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在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叛变后，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在后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猖獗时，他坚持工作，尽力保持党和国家大权不完全落入“四人帮”的手中。周恩来在工作，这本身就是同“四人帮”的一种极有力的斗争。他在病中的日日夜夜，是以生命来同“四人帮”拼搏，坚强有力地捍卫了党、国家和人民。

鞠躬尽瘁 死而未已

钱 嘉 东

1976年1月15日，是亿万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怀的一天。

这天下午，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已经结束，参加追悼会的人也已散尽。但是，在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在那哀思笼罩的十里长街，却仍然站满了许许多多不愿离去的人们。他们迎着凛冽的寒风，噙着悲痛的泪水，关切地注视着人民大会堂前的每一个动静。现在该是移送总理的骨灰到八宝山去的时候了。人们多么渴望能够再看上总理一眼，向他致最后的敬礼，目送他去那永远安息的地方。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夜幕已经降临，两面的街灯也象不耐烦似地亮了起来。可是，总不见那辆人们熟悉的把总理的骨灰送往大会堂的黑色轿车出来。敬爱的总理，您上哪里去了？人们不禁焦急地发问着，期待着……

然而，此时此刻，会有谁想到，总理已经不回八宝山了。就在那个不寻常的夜晚，一架农林业用的小飞机，划破寒冷的长空，正在完成一项庄严的使命——遵照总理的崇高遗愿，把他的骨灰默默地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

第二天，当报纸和电台把这个消息传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七天来一直沉浸在无限哀伤中的全国人民更是肠断心碎，悲痛欲绝。人们捶胸顿足，呼天唤地，喊道：总理啊，

总理！您为什么不把您的骨灰留下，好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到您长眠的地方寄托我们的思念，倾诉我们的心声！

人们不断地思索着，这到底是为什么？

总理逝世后，党和国家失去了中流砥柱，“四人帮”更加猖狂，阵阵阴风不断袭来。人们看在眼里，恨在心间，不禁闪起一个念头：啊，总理，您真有远见！您早就料到了这一切，所以才没有把您的骨灰留下！的确，总理对“四人帮”是早有警觉的，直到他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还一直在同这一伙反革命分子进行着坚决的斗争。然而，这决不是、也不可能是总理要求不保留自己骨灰的原因。

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逐渐地理解了总理这一遗愿的深刻意义。保留骨灰或不保留骨灰，不过是丧葬制度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就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同总理一生所经历和处理的一切问题一样，也反映了他那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反映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革命品德。

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一直是实行土葬的。解放前，只要走出城镇一看，大大小小的坟墩土堆几乎无处不有，侵占了多少山林、良田、沃野。解放后，总理就主张改变这种传统的丧葬制度，提倡变土葬为火葬。1956年，我们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倡议实行火葬，总理是带头响应者之一。1958年，他专门派人到重庆把抗战时期葬在那里的他的父亲和邓颖超同志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让地面重新种上了庄稼。60年代以后，总理的思想又进了一步，他不仅认为人死后应该火化，而且也没有必要保留骨灰。他那崇高的遗愿就是早在那个时候就立下了的。

他在国务院的一次会上说：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总理还主张人死了应该做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的治疗还没有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说这话时，他的神情是那样自然、安详，胸怀那样旷达、坦荡。他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希望。

从土葬到火葬，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似乎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然而正如邓颖超同志所说的，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总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呕心沥血，献出了毕生的精力，鞠躬尽瘁。但是，他想得更远、更高，死而未已。他在“死有所归”的问题上，又给我们留下一份精神财富。

总理逝世后，他的遗愿实现了。他的遗体解剖了，火化了。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邓颖超同志深刻理解人们的心情，在追悼会结束后，她向总理的亲属专门解释了总理生前的遗愿。她说：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还要用愉快的精神为解除伯伯的痛苦共同跟伯伯向疾病作斗争。你们的伯伯在知道他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我们国家在对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50年代，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倡议下，许多高级干部签名，决定实行火葬，这是对我国几

千年的旧风俗的重要改革。在中央做出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伯伯的肉体虽然不存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国的大地河流里作为肥料，仍在为人民服务。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一行动。伯伯的遗愿实现了。伯伯的心愿，我已经了却了。

有人曾问，总理的骨灰难道都撒了，一点也没有留下吗？只要想到总理彻底的革命精神，就不难想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总理生前唯恐对党对人民的贡献不够，死后怎么还会有任何一点的保留呢？

也有人问，总理的骨灰撒在了什么地方？只要想到总理一贯的谦逊美德，就不难了解对这个问题是得不到答案的。总理生前从不愿意把他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开辟为纪念性的场所，又怎么会让人知道他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呢？

参加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的人民群众说得好：总理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须保留自己。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

（原载《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

继承遗志 永远向前*

邓 颖 超

刚才，你们都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的追悼会，我在这里同你们见见面，有些话谈一谈。

恩来去世了，你们都很悲痛，我也很悲痛。但是，悲伤和眼泪都不能使死去的人复活了。

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讲得非常好。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一个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恩来同志正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人民的勤务员。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样一个崇高目标的。你们在座的，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共青团员，有的虽然不是党员团员，但都是革命同志，都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恩来的遗志，努力做好我们各自的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

今天在座的，有为恩来治病的医务人员，护理人员。这些同志，他们政治上可靠的，医疗技术是我们国家第一流的。他们受到了党中央的最大信任和委托，对恩来的病作了精心的多方面的治疗和护理，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尽了最大的

* 这是邓颖超同志在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同志追悼会后，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和亲属的谈话。

职责。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工作态度是十分感人的。恩来生前曾经多次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里，我也要代表大家向这些医生，向参加护理工作的人员，表示深切的感谢。

癌症终于夺去了恩来的生命。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我们国家在对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50年代，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倡议下，许多高级干部签名，决定死后实行火葬，这是对我国几千年的旧风俗的重要改革。1958年，恩来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恩来还把他在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做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从土葬到火葬，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恩来虽然去世了，

但他给我们还留下了精神财富，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恩来的这一行动。他的这一遗愿实现了。他的心愿，我已经了却了。

恩来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这件事，我已经向党中央做了报告。中央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还向我说过，一定不要特殊化。我个人是坚决执行的。对于丧事，我是严格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提出一项个人的要求，一切都由治丧委员会决定。恩来的遗体是由西华厅党支部保护下火化的，并将他的骨灰盒放在吊唁的地方，因为他是西华厅党支部的党员，在具体执行吊唁他的仪式时，有些事情应该放到支部里去做，由支部的同志来承担。我想这是符合他生前愿望的。

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他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为党和人民虽然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不要夸耀，不要吹嘘，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向革命的老前辈学习。

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坚强，不要过分的悲伤。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在新的革命路上永远向前进！

（原载《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编 后 记

学习、研究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理论、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是学习、研究周恩来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和周恩来当时的极其困难的处境，研究周恩来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有相当大的难度。这部著作开了一个好头。

书中《“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一文由方平撰写，为使内容更丰满，还选载了邓颖超等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理论与实践。

另外还约请梁进珍辑述了《周恩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文电述要》。这部分是根据《周恩来选集》、《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教育文选》等书中的有关文电整理而成。另外，还参考选用了《老一辈革命家著作注释选》等著作中的注释。

这本书的出版，只是学习、研究周恩来“文化大革命”期间理论与实践的开始，期望着更多更好的有关著作问世。

编 者

1991年9月